



前言

冷战指的是从 1945 年至 1991 年间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所进行的激烈对抗。这两大洲的巨人间没有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因而“冷战”这一描述是很准确的。现在，一切都已过去，其结果已众所周知，如果把这一时期重新定义为“长时期的和平”倒是颇为令人耳目一新的。

由于德国分裂和 1945 年东欧建立起了以前苏联为首的阵营，冷战在欧洲开始形成。随着 1989 年以前苏联为首的阵营崩溃、1990 年德国恢复统一以及 1991 年前苏联自身最终解体，冷战宣告结束。在这 45 年间，冷战遍及亚洲、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本书着重论述的不是全球范围内的冷战，而是 1945 年以来美苏之间的特殊关系。

意识形态和核武器造成了苏美关系的特殊性。冷战本身就是一场宣传战：各方都以一种绝对而坚定的方式宣传各自的意识形态。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前苏联坚信，只有以战争的手段消灭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才能赢得胜利；而美国相信，只有前苏联的共产制度崩溃后，这个世界才可能有持久的和平。正是受各自不同的意识形态的驱使，这两个超级大国踏上了冲突之路。

然而，冷战又与首次出现的核时代有关。核武器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武器，其杀伤力之巨大是历史上任何一种武器不可比的，比如，一艘三叉戟核潜艇所承载的火力的就大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投掷的全部炸弹

的总火力。

美国和前苏联都很愚蠢地卷入到一场死亡舞蹈之中，尽管各自都清楚手中的核武器永无使用的可能，但还是以此恐吓对方。核战争的危險犹如一团灭绝人性的毒云始终飘浮在冷战的上空，这是史无前例的，这是一段虽无核战，却胜似核战的历史。希望此书能给读者传送有关冷战的某些信息。

在此，我要感谢那些为我们加深对冷战的理解而作出巨大努力的美国学者们，同时，我还要提及一些专著的作者，他们的一些观点对我的影响颇大，这些作者是：乔治·凯南、路易斯·哈利、雷蒙德·加特霍夫和 J·L·加迪斯。

约翰·W·梅森

1996 年

第一章 冷战在欧洲的起因（1945 年-1949 年）

1917 年：苏美外交政策的历史根源

在 20 世纪中，1917 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就在这一年，两个欧洲以外的大国——苏联和美国——踏进历史的主流，宣告两个对立世界的意识形态。威尔逊总统领导下的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为了恢复

大国间的力量均衡，而是旨在结束整个欧洲的国家体系，并在新的国际秩序下“让世界安全地走向民主”；而列宁领导下的俄国，在经历了十月革命之后，退出了战争，并号召人们开展一场“世界”革命。就意识形态而言，严格意义上的冷战从1917年就已开始，然而，只是在1945年以后、人们才感觉到这两个事件的全部影响，那时，政治势力从欧洲的中心转移到了莫斯科和华盛顿。

苏联外交政策的形成主要源自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来自1917年以前沙皇俄国的历史经验。17世纪以来，俄国一直遭受到特别是来自西方的进攻和侵犯，因而总是存在着不安全感。第二，1917年十月革命后，俄国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接着在1918年至1920年就受到了西方盟国的入侵。丘吉尔关于“把布尔什维主义掐死在摇篮里”的讲话使苏联领袖们更加坚信，西方的目的就是要对苏联形成一个资本主义的包围圈。第三，马列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的预言极大地鼓舞了苏联。但正如列宁所说，在消亡之前，“苏维埃共和国与资产阶级各国之间一系列激烈的冲突不可避免。”

如果说苏联一直感到弱小而缺乏安全感，那么相反，美国却很有安全感，并意识到自身的强大，因而美国的历史经验就是奉行孤立主义。然而，当日本于1941年12月袭击珍珠港从而把美国拉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时，罗斯福总统才重使伍德罗·威尔逊的博爱论调得以流行。他

从抽象的民主原则和经济自由的角度（后来这些都融入了 1942 年的《大西洋宪章》和 1945 年的《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中）为美国的外交政策辩解。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这些高谈阔论使苏联感到恼怒，但是这恰好反映了美国长远的经济利益。罗斯福提倡的是一种“门户开放”的经济政策，即自由贸易和对原料的平等占有，其目的是为了防止重蹈 30 年代经济大萧条的覆辙。

1945 年后，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都需要安全保障，但是，它们对此的解释各不相同。1945 年后，苏联仍是一个地区性强国，“安全”对其而言意味着它的边界上都是一些“友好的”邻国。而美国是一个全球性的经济大国，“安全”对其而言则意味着一个金钱、货物和人才都能自由交换的开放的世界。

1945 年同盟国分裂：雅尔塔和波茨坦

1941 年 6 月 22 日，纳粹德国以 270 个师进攻苏联，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陆战。此时，美国公众仍持一派孤立主义论调。然而，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袭击美国的珍珠港海军基地以及 3 天后希特勒向美国宣战，此后美国才与英国和苏联结成同盟。关于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几乎立即在盟国中成为首要话题。

1944 年 6 月，第二战场终于开辟，但是直到那时苏联在抗击德国

的战争中一直首当其冲，其损失是惨重的，估计苏联和美国士兵的阵亡比例为 50 : 1 。不论第二战场迟迟未能开辟的理由是什么，但它的开辟对战后的政治格局毕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西方竭力想从会议上得到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西方的主要目标是打败希特勒，但也担心苏联的力量向东欧渗透。在此，波兰是关键。

1939 年 9 月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在波兰全境爆发；同样，1945 年以后，波兰也是冷战起因的中心。1944 年 10 月，纳粹占领军粉碎了亲西方的华沙起义，此事得到苏联的默认。现在越来越清楚的是，苏联所谓建立东欧“友好”政府的想法根本不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

尽管各自的分歧明显，但为了达成一些协议，三大国（美、苏、英）于 1945 年 2 月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开了一个星期的会。在雅尔塔，三大国一致同意将德国划分为四个占领区，德国投降 3 个月后，苏联将参加对日作战。但会议的最重要议题是波兰。斯大林只承认在卢布林建立的波兰共产党政府；同时，他还在《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上签字，这一宣言呼吁东欧各国政府“广泛代表所有的民主分子……并自由选举代表人民意志的政府”。罗斯福是否真的相信苏联会信守在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进行自由选举的诺言？如果他不相信，那么他将这个想法秘而不宣并引导美国人民相信苏美之间不存在任何根本

的分歧，这就大错特错了。斯大林善于把理想与现实统一起来。苏联红军占领波兰后，光凭一纸宣言是赶不走它们的。1945年4月斯大林当着南斯拉夫的米洛万·吉拉斯的面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这场战争不同于以往的战争：谁占领了地盘，谁就能把他的那套社会制度推行到他的军队所能到达的地方去。此外，别无他途。”

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逝世，副总统哈里·杜鲁门继任总统。某些历史学家曾把从罗斯福向杜鲁门转移视为冷战开始的时刻。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杜鲁门企图改变罗斯福的对苏政策。既没有找到什么解决波兰问题的方案，也没有就联合国的未来达成什么协议。然而，1945年5月，杜鲁门断然中止了对苏联的租借援助。

1945年7月，三大国首脑在柏林郊外的波茨坦举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后一次会议。主要议题是德国问题：虽然三大国在共同占领德国和解除德国武装的问题上达成了协议，但是赔偿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最终三大国达成了一项复杂的协议，协议规定，苏联将从苏占区内获得赔偿，还将从西占区获得25%的机械设备和工厂。作为回报，苏联将向西占区提供相当于它从西区得到的总值的60%的粮食、煤和原材料。

“原子外交” — 广岛及其以后

波茨坦会议一周后的 1945 年 8 月 6 日，美国向日本广岛投掷了第一颗原子弹。关于这颗原子弹对美国的对苏外交政策以及对冷战的起因产生什么影响，在历史学家中间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加尔·阿尔佩罗维茨在他的《原子外交》修订本一书中断言，美国拥有原子弹的直接后果便是杜鲁门对苏采取了强硬态度。

阿尔佩罗维茨争辩说，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主要是为了向苏联显示自己的军事实力，日后就可以以此作为向在东欧部分的苏联敲诈的一种外交手段。诚然，1945 年秋，杜鲁门开始推行一条对苏强硬路线，但主要原因还是国会中共和党人施加了压力。与此同时，美国开始裁军，1 年之内，把 1200 万兵员削减到 300 万，这就减弱了讨价还价的本钱。

在 1945 年 9 月举行的伦敦外长会议上，美国拒绝承认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亲苏政权。但没有证据可以证实斯大林的外交政策因美国拥有原子弹而受到影响。亚当·乌兰认为，美国稍早拥有原子弹（1949 年 8 月苏联爆炸了自己的原子弹），使其产生了一种马其诺心理，这实际上削弱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乌兰写道：“就像一个吝啬的守财奴，美国紧抱着这短暂的原子弹垄断不放，却不懂得如何去开发利用，或以此换取有用的东西。”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三大国对战后在欧洲和远东构筑何种政治格局

意见各异，这为冷战的发生创造了条件。各方均按各自的历史信条行事：当德国在 1945 年 5 月崩溃时，三大国对欧洲乃至世界的未来框架就各执一词，矛盾突现。所以冷战决不是哪一个事件或哪一项决定的产物，而是苏联与西方在意识形态和利益方面根本性冲突造成的结果。

东欧：冷战竞技场，1945 年

冷战的一个直接起因是苏联与西方在东欧问题上的冲突。丘吉尔在雅尔塔会议上声称，对英国来说，波兰的命运是一个荣誉的问题。斯大林回击说，对苏联来说：

“这不仅是一个荣誉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安全的问题… … 不仅是因为我们与波兰为邻，而且因为整个历史上波兰一直是进攻俄国的走廊… … 在过去的 30 年里，我们的德国敌人曾两次穿过这条走廊… … 对苏维埃国家来说，这不仅是个荣誉的问题，而且是个生死的问题。”

相对于其他东欧国家，斯大林关于波兰的上述讲话是千真万确的。因此，他坚持这些东欧的政府对苏联应该是“友好的”，实际上，这意味着他不能容忍什么自由选举。

相反，美国在东欧的利益就显得抽象而理想化。美国与这一地区相距万里，也几乎不存在传统上的贸易关系。必须提醒的是，大多数东欧国家— 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 都是根据伍德罗·威尔逊

总统倡导的民族自决原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旧的君主帝国中诞生的。在人民有权选择自己政府的形式及生活地的原则的基础上，1945年罗斯福决定在该地区推行公正和持久的和平格局。这一点对于理解他对东欧采取的战时外交是至关重要的。这意味着所有关于改变疆域的决定将统统搁置到战后再说，这一行动步骤实质上等于对东欧采取一项“没有政策的政策”。与此同时，随着苏联红军的推进和斯大林加紧培训接管政权的东欧各共产党领袖们，东欧的未来就被预先确定了。

在苏联红军占领了波兰战前的全部领土后，1945年1月，作为波兰的临时政府，亲苏的卢布林委员会宣告成立，此后再也没有进行过自由选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年内，苏维埃式的共产主义遍及了欧洲11个国家，所辖人口超过1亿，这些国家是：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均被苏联直接吞并）、波兰、德国东区、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在苏联成功地将其政治和社会制度推广到东欧的时候，西方惶惶不安，人们普遍担心，在1946年和1947年，也许希腊、意大利乃至法国都将会先后沦陷。

1946年：“铁幕”降落欧洲

在冷战的历史长河中，1946年是被忽视的一年。因为它处于1945年（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和1947年（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

划)这两个令人瞩目的年份之间。然而在这一年中发生了一件足以把1946年算作冷战开始的大事。

1945年以后,伊朗成了苏联与西方最直接的对抗地。起初,英国人比美国人更担心战后苏联是否会结束它对伊朗北部的占领。当苏联拒绝在战后6个月内撤走军队时(这是1943年《英一俄一伊朗协定》确定的),杜鲁门政府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于1946年2月敦促伊朗首相抵御向该地区继续推进的苏军。这标志着美国政策的一个根本性转变。用弗雷泽·哈伯特的话来说,就是此事表明了“地缘政治深刻转变的开始,美国第一次被迅速地推向了东地中海和近东的英苏对抗的中心”。此后,美国便在该地区担当起阻止苏联影响过度膨胀的责任。

也是在同一个月,1946年2月,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密苏里州富尔敦城发表了他那著名的“铁幕”演说。他试图把苏联描绘成一个扩张主义国家,试图彻底改变雅尔塔对苏联的包容态度和政策。他论证,苏联的威胁不仅来自军事扩张,而且来自内部颠覆。丘吉尔呼吁建立英美同盟以迎击苏联挑战,虽然这样做的时机不够成熟,但是他的演说标志着雅尔塔精神的一个重大转向。

在1946年中,莫斯科和华盛顿也未能就原子弹的管制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巴鲁克计划倡议建立一个由联合国主持的“国际原子能发展机构”来掌管所有的储铀库,使其只用于和平目的,但却让美国拥有继续

生产原子弹的权利。苏联理所当然地拒绝了使美国享有核垄断永久地位的巴鲁克计划。就在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的同一个月，美国驻莫斯科代办乔治·凯南给华盛顿的杜鲁门政府发了一份长达 8000 字的电报。这份著名的长电报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五角大楼传阅着这份电报的复印件，它简直成了“美国决策者的圣经”。凯南在电报中声称，苏联不相信在共产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有和平共处的可能。凯南认为，在克里姆林宫对国际事务的神经质观点的深处是“一种带有马克思主义教条且本能的俄罗斯不安全感，这使得苏联扩张主义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危险、更狡诈”。

凯南分析报告的含义是令人吃惊的：如果苏联的对外政策不是对外部世界所发生事件作出的回应，而仅仅是苏联内部各种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那么，无论美国采取什么行动，都不会消除苏联对西方的敌视。凯南所建议的政策可以归纳为一个词，这就是“遏制”。本质上，遏制是一项处于孤立主义和先发制人的战争之间的中间政策。1947 年杜鲁门政府把“遏制”政策作为了一项官方政策。

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1947 年）

1947 年初美国的对外政策处于混乱状态。众所周知，1946 年美国开始对苏联采取一种咄咄逼人的态势。然而，由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却

打算削减军费，而且无人知道如何凭借核垄断地位赢得外交优势。美国公众对来自苏联的威胁将信将疑。在这种情况下，杜鲁门也感到束手无策，但是 1947 年希腊危机为他提供了一个机遇。

1947 年 2 月，英国政府两次照会美国国务院，称英国政府计划在 3 月 31 日后中止对希腊和土耳其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杜鲁门政府将采取何种对策呢？时任国务卿的迪安·艾奇逊在他的题为《创造战后新世界亲历记》的回忆录中描述了他与国会领袖们在白宫会面的情况：

“这帮国会议员对他们面临的挑战全然不知，我的任务就是向他们解释清楚……我说，在过去的 18 个月内，苏联在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在伊朗、在希腊北部施加的压力已经把巴尔干半岛变成了稍有裂缝就可能使三大洲都将面对苏联渗透的一个地方。就像一筐苹果，一个烂了就使整筐烂掉一样，希腊一垮，就会影响伊朗及其以东地区。这种影响还会遍及到非洲，通过小亚细亚影响埃及，通过意大利和法国影响欧洲，而这两个国家已经受到了西欧最强大的两个国内共产党的威胁。”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后来被称为“多米诺理论”的一种最初表述，“多米诺理论”主导并困扰着美国的对外政策达整整一代人，在越南战争中，这一理论还引发了激烈的辩论。

为了争取共和党人对他援助希、土计划的支持，杜鲁门不得不从民

主与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对抗的角度向美国人民阐述他的要求。结果，他于1947年3月12日在国会的演讲中所宣称的那些内容以后成了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主要内容。杜鲁门声称每个民族都必须在两种生活方式中作出选择，他说美国的政策就是“援助各国为争取自由而反抗企图通过外部压力或少数派武装实施奴役的人民”。杜鲁门的这一番话实质上等于开出了一张空白的外交政策支票，将来任何国家只要有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的迹象就可以拿着这张支票去兑现。到处可以听到那些援助“自由人民”的十字军以一种普渡众生的言辞传播杜鲁门主义：这为美国未来20年的对外政策定下了基调。

在杜鲁门主义盛行的年代，西欧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新任国务卿乔治·马歇尔为此制定了一项向欧洲大量提供援助的计划。欧洲复兴计划(马歇尔计划的正式名称)向欧洲16国提供了132亿美元的贷款和实物。

马歇尔计划在经济上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到1952年，欧洲工业生产水平比战前上升了3500。把德国与这项欧洲范围内的复兴计划联系起来的做法，为复兴德国经济而又防止德国称王称霸的问题找到了答案。对那些主张人道的人们来说，马歇尔计划为经济状况极度糟糕的欧洲送去了长期援助；对于美国国内那些担心出口萎缩而引起经济萧条的人们来说，这项计划提供了一条振兴世界贸易的途径；对于那些担心共

产党人在西欧进行颠覆活动的人们来说，这项计划为创造良好的民族经济环境，以便把西欧各国工人阶级吸引到自由资本主义政权一边去提供了一种手段。

马歇尔计划的巨大成功引发了苏联与西方关系的危机。苏联理所当然地拒绝接受这项计划，其随后对计划的谴责和讨伐决定了欧洲政治、经济的分化。到 1948 年春，欧洲分化成两个相互对立的政治和经济集团，一个依附美国，一个依附苏联。1947 年 9 月，苏联对马歇尔计划作出了回应，这就是成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情报局是一个以宣传鼓动为主要工作的临时性机构——确保欧洲的共产党俯首听命于莫斯科，同时鼓吹苏联的道路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惟一正途。

加紧巩固苏联对东欧的控制是这个新成立的情报局的另一项工作。1948 年 2 月，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政变使这一进程达到了顶点。到 1948 年底，波、匈、罗、保、南、阿的非共产党领导人都受到政治清洗、非法审讯和恐怖活动的迫害，其势力已不复存在。与东欧其他各国情况不同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只有它才可能把西方式的民主与苏联要求的“友好”协调一致起来。

但是，1947 年后期，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状况开始恶化，共产党人内政部长把可信的同志们安插到关键的警官职位上，并准备审讯政治反对派。当非共产党人的政府阁员以辞职表示抗议的时候，贝纳斯总统

于 1948 年 2 月组成了一个全部由共产党人组成的内阁。捷克政变“在文明世界掀起了震荡波”。布拉格事件有助于赢得人们对杜鲁门遏制政策的支持。举例来说，2 个月后，马歇尔计划就得到了美国国会内绝大多数数的支持而获得通过。

德国问题、柏林封锁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48 年-1949 年)

1948 年 6 月发生的柏林封锁事件标志着斯大林拒绝马歇尔计划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阶段。为了更好地理解柏林问题，有必要了解德国在 1945 年后苏美关系恶化中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4 个获胜的同盟国（美、苏、英、法）在波茨坦会议上一致同意，处置被占领的德国必须遵循非军国主义化、非工业化、废除中央集权、民主化和铲除纳粹主义等五原则。德国被划分为 4 个占领区，但仍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由总部设在柏林的盟国管制委员会行使管制职能。在苏占区内 110 英里处的柏林也被划分为 4 个区，同样地，由盟国军事管制总部统一管理，并直接向盟国管制委员会报告工作。

德国在欧洲中心的这一地缘政治位置，还有它具有的工业潜力，使得德国成了一个在欧洲乃至全球均势中的关键国家。“谁拥有德国，谁就拥有欧洲”，列宁的这句名言依然适用。但德国在 1945 年彻底崩溃

后，每一个占领国都有机会按照自己的形象去塑造自己的占领区，其结果就是德国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军事上遭受分割。

当苏占区与西占区在复杂的赔偿问题上没能达成一致之后，双方于1946年出现了第一次破裂。1947年1月，西方即以把英、美两个占领区进行合并予以回敬。西方强烈要求复兴德国经济并把西方三个占领区纳入欧洲复兴计划。这正是苏联所担心的。占有德国总人口的3 / 4，且占有历史悠久的工业心脏地带（鲁尔和莱茵兰—威斯特伐利亚）的这样一个国家很可能成为生活在苏占区的德国人关注的焦点。更让苏联人担忧的是一个与美国紧密结盟的联邦德国有朝一日可能再次成为一个军事强国，从而对苏联本土产生威胁。

1948年6月24日，就在西方大国在西占区内流通新货币的第二天，苏联当局切断了通往西柏林的所有水陆交通和货运，开始对柏林实行封锁。苏联认为，柏林是一个显示实力的理想之地。柏林深陷在苏占区内，240万西柏林居民只能听任苏联占领军的摆布。法律上，西方没能达成一项确认其有权从陆地进入柏林其他区域的书面保证。面对苏联的这一挑衅，美国人和英国人遂派出大量飞机向柏林被困居民空运粮食、燃料及其他生活必需品几乎达1年之久。向柏林昼夜不停的空运引起世界极大的关注和猜测，苏联由于被描绘成试图饿死妇女儿童，形象大受损害。

1949年5月，斯大林意识到柏林封锁并不成功，只得收兵。在两大冷战对手之间的公开冲突中，柏林首当其冲。但这并没引起它们间的热战，美国没有凭借手中独有的核武器去打破封锁；而苏联也没有利用自己的常规军事优势把西方赶出柏林。苏联之所以如此克制，也许与美国在危机中向英国基地转运了60架能携带核弹的B-29轰炸机不无关系。

苏联对柏林实行封锁虽然是对西占区实施币制改革的一个回应，但真正的原因是企图把西方盟国撵出柏林，阻止它成立一个亲西方的国家。柏林冲突远不是一场外交磨擦，它具有战争的一切特征，然而美国拥有原子弹使这场冲突变得与众不同。核武器的存在使经典的军事战略首次产生了革命性改变，它缩小了双方的选择余地。任何一方都无法利用各自的军事力量的特长。柏林是在核时代的第一次冲突，双方都显示出冻结地理现状的明显倾向。20世纪40年代后期发生在欧洲的一系列事件最后以柏林封锁而告终，西欧领导人从中清楚地认识到，只有美国才能确保欧洲的均势。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认为，因德国的崩溃和装备精良的苏联的出现而变得四分五裂的欧洲需要美国。1949年4月在华盛顿签署的北大西洋公约回答了这个问题。

北约的成立事实上是出于心理上的目的。建立欧洲共同防御的战略思想再简单不过了，这就是美国有能力提供原子弹。只有让属于他们的

那一半欧洲大陆披上核斗篷，西欧人就有了一块为经济的复兴和抵御共产主义的颠覆而工作的安全基地。1949年在“铁幕”两边的陆军师的比例大致为125，14，这一比例大大有利于苏联人，但谁也没有想过要去调整这种不平衡状态。这是北约心头上的窘境，因为在政治上北约不可能组建一支能与苏联红牢相匹敌的西欧地面部队，北约不得不依靠原子弹去阻止苏联的进攻。美国的核保证就是这一同盟的基石。

第二章 共产党中国和亚洲的冷战 (1945年—1953年)

1950年6月25日清晨4时朝鲜战争开始，直到1953年7月27日最后签订停战协定，这

场战争持续了两年多。这是1945年以来至今美中两大国军队在战场上所发生的惟一一次正面冲突。这场战争改变了美、苏、中三国在亚洲的相互关系，在接下来的20年内，把三国之间的关系冻结在了冷战状态之中。

朝鲜半岛处于中国和日本的战略联节点上，本身的位置相当敏感；然而，它却因政治上分裂，经济上落后，以致苏、美两国在1950年以前就撤走了各自的占领军，可是在50年代，半岛的局势却变得扑朔迷离起来。为了理解朝鲜战争为什么在东西方关系形成过程中能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有必要对两个相互关联的事件进行一番研究：一个事件是

1949 年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另一个是美国向亚洲推行遏制政策的企图。

毛泽东和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1949 年)

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人在 1911 年推翻清王朝，建立了共和国。此后，中国内战连年不断，没有哪一个政府能在大半个国家内建立起自己的统治。1925 年孙中山逝世后，中国出现了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派别，这就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1937 年日本进攻中国，从而拉开了远东战争的序幕，在抗日战争中蒋介石和国民党成了美国人的主要盟友。1945 年，罗斯福总统认为，中国可以作为保卫世界和平的“四警察”（与美、苏、英一起）人选之一。然而，罗斯福做梦也没有想到，美国与之结盟的竟是一个贪污腐败、丧失民心的政府，任凭美国投入大量的金钱和武器都无济于事。当时在国会内有一个阵容强大的中国院外集团，他们视蒋介石及其受美国教育的蒋夫人为“自由中国”的伟大领袖。亨利·卢斯，这位有影响的新闻界大亨、《生活》和《时代》两份杂志的发行人，在 1945 年把蒋介石的头像作封面人物的次数比任何一位世界领袖都要多。为上述两份杂志撰稿的记者 T·H·怀特就因为暴露了蒋介石政权的黑暗面而被卢斯炒了鱿鱼。他在中国回来后写的题为《中国爆出惊雷》一书在 1946 年立即成了热门的畅销书。怀特亲

眼目睹了 1943 年发生在河南的大饥荒，这使他坚信蒋家王朝是注定要失败的。蒋介石政府既没能抗击住日本人，又无法解决国内贫穷和腐败这两个糟糕的问题。怀特在书中写道：

“如果我是一个河南农民，我也会像他们一样在一年后投奔日本人，并帮助日本人击败自己的中国军队；我也会像他们一样在 1948 年投向战无不胜的共产党人一边。”

中国共产党于 1921 年由毛泽东和一小组他的同志们建立。当蒋介石于 1927 年在上海屠杀了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后，毛泽东率领他的 10 万人的部队开始了传奇式的“长征”，幸存者最终到达中国西北部的陕西省。从那里开始，共产党人与日本展开了游击战，并在战斗中建立了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大部队。到 1945 年日本投降时，共产党已经有了一支百万人的大军，占领了 1 / 4 的中国，管理着几乎 1 亿中国人口。

如何解释从 1937 年到 1945 年国共两党的运气所出现的 180 度大转变呢？从它们对日本侵略中国所持的不同反应、采取的不同方法上可以找到线索。日本从 1937 年起占领了北起北京南至广东相当于 1 / 3 中国的东部国土。国民党的战略是撤退到长江上遥远的西北重镇重庆，企图以空间换取时间。蒋介石对国内敌人的担心远甚于对国外敌人的担忧，他曾说过：“日本人好比是皮肤病，而共产党就是心脏病。”蒋害怕失去地主的支持而不愿在农村中进行土地改革，因而他无法争取广大

农民站在他的一边。更有甚者，他拒不抗日。这意味着在中国最热忱的爱国者，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这就产生了一个自相矛盾的结果：与其说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使共产党赢得了声望，不如说是国民党的所作所为让共产党深得民心。

美国的政治领袖们对在农村进行的共产主义革命实际上丝毫没有注意。美国公众舆论一说起中国，就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不是被忽视就是被视为受苏联煽动的世界阴谋的一部分。这样根深蒂固地来误解中国发生的事情，必然给中美关系和苏美关系带来极为有害的影响。1945年8月14日，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但在中国却摆开了一个血腥的内战舞台。国民党军队依仗大量美援，占据了北方大部分城市，而共产党游击队只控制着农村。为了制止内战，杜鲁门总统于1945年12月派遣马歇尔将军到中国，试图让国共两党接受停战。1年后马歇尔的调停努力终告失败，部分原因必须归咎于美国仍继续向国民党提供援助。

在以后的几年内，美国对华政策，用迪安·艾奇逊的话来归纳，那就是“让尘埃落定”。国民党初期在人数和装备上胜于共产党的这些优势很快被挥霍殆尽。国民党军队士气低落，国民党官员大量鲸吞公共财物，霸占土地，中饱私囊，脱离民众。到1948年，共产党军队已掌握了东北和华北的军事主动权。此时，已担任美国国务卿的马歇尔拒绝国

国民党政府提出的增加军事援助的请求，并声明，蒋“值得支持多久，美国就支持他多久”。可是到1949年，这样的时间也过去了。国民党撤退到了台湾岛，共产党新政府于1949年10月1日由毛泽东在北京宣告成立。

所谓“丢失”中国一事在整个美国掀起轩然大波，甚至在毛泽东取得胜利之前，杜鲁门政府因其对共产主义过于“软弱”而受到强烈抨击。杜鲁门政府在劝说美国公众同意其在欧洲推行遏制政策上是成功的。1947年到1949年，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以及北约阻止了共产主义在西欧的蔓延。然而，国会内外许多蒋介石的支持者们却质问道，在中国，共产主义何以得不到有力的制止呢？杜鲁门政府对此的回答从未令人信服，因而它就不得不受到政敌无休止的指责。

美国对中国时局的发展束手无策，但这场“丢失中国”的辩论却此起彼伏，始终没有销声匿迹。1948年11月，杜鲁门在总统选举中以惊人的胜利击败了共和党对手托马斯·杜威。这样，自1933年以来一直饱尝失势之苦的共和党人结束了他们对杜鲁门对外政策的支持。同年8月，苏联爆炸了一个原子装置，从而结束了美国的原子垄断地位，战略前景被大大改观。

1950年2月，中国的新政府与苏联缔结了同盟条约，同一个月，威斯康辛州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的一次演讲中声称：“我

手上有 57 个案例，这些人（国务院内）… … 看起来不是持证的共产党员，就是共产党的忠诚分子，但是谁在协力制定我们的对外政策呢？”

20 年后，共和党人终于找到了一个能使他们重返政坛的问题，这 20 年被麦卡锡称为“叛卖的 20 年”。麦卡锡主义的政治迫害在美国国内造成的后果无需我们去关注。在对外事务方面，麦卡锡主义造成了两个方面的后果，一个是普遍的，另一个与众不同。首先，指责国务院远东处“丢失”了中国，这一指责把整整一代中国问题专家赶出了国务院，在对外政策这一重要领域内没有一个专门人才；其次，麦卡锡主义使杜鲁门政府处境被动，因而，当广大民众呼唤朝鲜战争完全胜利的时候，而总统却难以在朝鲜去打一场“有限战争”。

朝鲜战争：冷战的“珍珠港”

1945 年日本战败后，朝鲜以三八线为界被划分为由苏联控制的北方和由美国控制的南方。到 1948 年，朝鲜北方在金日成的领导下成立了共产党国家，苏联随后撤走了它的部队。李承晚领导下的朝鲜南方在北方强大的武力面前忧心忡忡。尽管如此，美国还是在 1949 年 6 月撤走了自己的部队，迪安·艾奇逊在 1950 年 1 月宣布韩国是美国太平洋“防御线”的外围。

当 1950 年 6 月朝鲜部队越过三八线的时候，世界一片惊愕。历史

学家们在谁怂恿朝鲜进入南方的问题上意见不一。中国不大可能有任何动机在朝鲜发动一场战争，中共关注的是国内经济问题。苏联在朝鲜的行动上起到何种作用？大多数西方观察家在那个时候都认为，金日成不过是斯大林的一个傀儡，对韩国的行动是由苏联一手策划的。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金日成在怂恿这场战争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美国历史学家布鲁斯·卡明斯认为，1950年6月，金日成不是听命于斯大林而采取行动的，而是出于统一国家，使南方革命化的根深蒂固的民族信念。

根据我们所知道的在关于朝鲜战争对苏美关系造成的灾难性影响的问题上，至今仍存有一个谜团：斯大林为何要批准朝鲜的行动？通常情况下，斯大林在对外政策上是小心谨慎的，朝鲜半岛由北方去实行统一在当时不可能是他的当务之急，尽管他希望看到朝鲜被一个共产党政权统治着。我们也知道斯大林不希望在朝鲜出现什么危机，所以他小心翼翼地不使自己过深地卷入冲突之中。这一点有事实为证，在战争开始1星期后，斯大林决定从朝鲜撤走所有的苏联飞行员和顾问，目的就是使苏联避免承担责任的风险。

美国对朝鲜的行动立即作出了决断。它把这事提交到联合国安理会，结果，安理会以9:0的绝对票数谴责朝鲜。一次表决就获得通过，这事虽说有点奇怪，但是，由于联合国拒绝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

而苏联从 1950 年 1 月就开始抵制安理会，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也就不足为奇了。苏联的缺席给美国提供了一个以联合国道义上的权威去支持美国行动的大好机会。

美国在回击一场全世界有目共睹的重大事件方面占尽了有利条件，它不像斯大林分子在一个难以判断究竟发生了什么的东欧进行夺权那样进展缓慢，而且情况复杂。无论是入侵者还是受害者都看得很清楚，这就是珍珠港事件的翻版。

朝鲜战争及其在亚、欧产生的后果

杜鲁门总统任命二战英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担任驻朝鲜联合国军总司令。战争开始后的几个月内，麦克阿瑟组织了一系列漂亮的反击战，把朝鲜军队赶出了南方。1950 年 10 月，麦克阿瑟便腾出手来在三八线以北作战。这下确实激怒了 中国，于是 中国派遣它的军队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到 11 月底，将近 30 万中国军队把联合国军赶回到三八线以南。

杜鲁门政府面临着一个进退维谷的窘境。麦克阿瑟将军要求使用原子弹以阻止 中国源源不断地向朝鲜增兵。在听到 美国可能在朝鲜使用原子武器的传言后，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急忙赶到华盛顿表示反对使用原子弹。更有甚者，华盛顿普遍猜测（后来证实是错误的） 中国之

所以采取行动是由于苏联的煽动，华盛顿也始终担心，根据 1950 年 2 月签订的中苏同盟条约，如美国直接进攻中国，就意味着将把苏联卷进来。

一旦杜鲁门政府选择了有限战争，那么，麦克阿瑟基于获得全胜的作战思想就没有施展的余地了。1951 年 4 月杜鲁门撤了麦克阿瑟的职。这位被称为“美国的凯撒”的男人回国时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但是美国的盟友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撤换麦克阿瑟在冷战期间意义非同小可，这一行动为有限战争和遏制政策的贯彻消除了一个主要障碍。最初决定越过三八线的不是军人而是两位平民：杜鲁门和艾奇逊，这一点往往被人们忘记。在朝鲜战争中美军伤亡总数的 4 / 5 发生在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以后。对于美国在朝鲜出现的问题，人们往往容易指责军方人士，特别是麦克阿瑟将军；但事实上，所有的重大决策都是由总统和国务卿作出的。面对公众的流言蜚语，杜鲁门仍然坚信，朝鲜不是一个向共产主义全面开战的地方。麦克阿瑟关于使用核武器的主张，即使在军事上行得通，也必将给美国在世界上的政治可信度和道德名望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害。

朝鲜战争又拖拖沓沓打了两年时间，任何一方都没能赢得有决定意义的优势。艾森豪威尔将军于 1953 年 1 月担任总统后不久，他通过印度大使间接地向中国发出警告说，如果在板门店的和谈桌上不能取得进

展，美国将考虑对中国使用原子弹。人们无法知道这一口信会有什么效果。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同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订，确定三八线的北侧为朝鲜、韩国之间的军事分界线。朝鲜战争一直被描绘成“本世纪最肮脏的小仗”，“小”当然是相对而言的。美国阵亡与失踪人数达3万3千人，受伤人数为10万5千人；韩国阵亡人数为41万5千人，受伤人数为42万9千人。据统计，中国和朝鲜的阵亡人数在150万人以上。这场战争把半岛固定地分解为北、南两方，并给这两个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痛楚和紧张的状态。

在朝鲜之外，这场战争造成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朝鲜战争发生前，北约仅仅是代表了一种想法和打算；战后，北约就完完全全地成了一个军事同盟。战前，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曾联合制定了一个针对苏联在全世界各地的威胁要求把美国防御费用增加3倍的著名文件，即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这份著名的政策文件被杜鲁门束之高阁。然而，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将文件要点付诸实施：1951年他把国防预算增加到500亿美元，而6个月前还只是135亿美元；1952年美国计划把北约部队从14个师增加到50个师，并就在欧洲建立美陆、海、空军事基地一事与盟国达成了一致。美国军事力量被直接输送到欧洲的心脏，这是朝鲜战争的结果之一。在远东，这场战争带来的后果也不算小，战争把冷战扩展到了整个太平洋地区。美国除了在韩国有驻军

外，与菲律宾缔结了联防条约（1951年8月），重新确定了美国在菲有建立和防卫海空基地的权利。1951年9月，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共同签署了三国安全条约，凭借这个条约，美国取代了英国的传统地位，充当起了这一地区的保护人。

在亚洲的防御区域内，对美国来说，最重要的是增加了日本这个国家。美国对日本的军事占领，如同它对德国的占领，起初都是为了防止战败国东山再起而对邻国的安全造成威胁。但是苏美对抗促使华盛顿尽快地重建日本经济，这样，日本就不致成为共产主义颠覆的一个诱人目标。朝鲜战争把日本从一个穷困潦倒的敌人变成了一个欣欣向荣的盟友，从而使美国把它估价在远东抗衡苏中两大国的一个重要砝码。1951年9月，美国和其他48个国家一道与日本签订了对日和约。同一天，华盛顿与东京缔结了日美安全条约，条约允许美国无限期驻军，日本把冲绳提供给美军作为一个主要军事基地。对台湾地区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来说，朝鲜战争的影响就是把它与美国史紧密地拴在一起。美国恢复了对蒋介石流亡政府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这种援助在整个50年代乃至以后的时期内从未停止。美国第七舰队驻扎在台湾海峡，在大陆与蒋政权之间插了一杠。1954年，美国更进一步与台湾地区缔结了共同防御条约。大多数非共产党国家继续承认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为“中华民国”，并保留其在联合国的席位，而拒不承认毛泽东的共产党政府。

朝鲜战争冻结了中美关系，使其在此后的 20 年内处于一个互不了解的仇视状态。

要想夸大朝鲜战争在左右冷战进程中所发生的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朝鲜战争一夜之间就结束了美国从 1946 年至 1950 年在对外政策上所表现出的不连贯性。到 1951 年，我们所掌握的与冷战有关的所有特征都呈现了出来，如高额的国防预算、北约组织的军事化、中苏结盟，此外，一种信念业已形成，即相信这个世界是紧密地相互联系的，任何一处的共产主义胜利都会威胁美国的重要利益。

朝鲜战争对在核时代打一场有限战争树立先例方面同样具有重大意义。1951 年 4 月，杜鲁门总统解除麦克阿瑟将军职务一事，就确立起了一种理念：即“胜利”并非是军事政策的惟一目标。在美国的近代历史上，朝鲜战争是第一场重要战争，在不以消灭敌方肉体和转变思想为目标这一角度上说，这场战争不是一场犹如十字军东征那样的宗教战争。朝鲜战争是杜鲁门的而不是麦克阿瑟的战争，即这是一场有限战争，不是一场全面战争，这场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核时代国际政治的某些现实。

第三章 和平共处与核对抗(1953年—1964年)

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和“新面貌”防御政策(1953年-1958年)

艾森豪威尔是介于杜鲁门(1945年—1953年)和肯尼迪(1961年—1963年)两届民主党政府之

间的一位共和党总统，在教科书中，其任期内的对外政策(1953年—1961年)常被说成是根本性断层。时任国务卿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因嗜好诸如“大规模报复”、“战争边缘”等令人毛骨悚然的好战措辞而闻名遐迩，在他主持下的对外政策被描绘成把美国引向核大战的边缘，其目的只是为了保卫亚洲某些局势不甚明朗的边缘地区。事实远非如此，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奉行的仍然是遏制政策，只是他们的侧重点和处事风格有些改变而已。正是朝鲜战争的经验使艾森豪威尔政府作出这样的改变。在遭受了朝鲜那场无法取胜的战争挫折后，整个50年代的美国对外政策长期蒙上了一层阴影。

1952年竞选期间，杜勒斯曾大声疾呼谴责遏制政策，说这个政策把无数人推向了专制和邪恶的恐怖主义，因而这是一个消极、无所作为和不道德的政策。他和艾森豪威尔都承诺要奉行一项“解放”东欧人民

的政策。与朝鲜战争的经历反其道而行之，共和党政府允诺将推行被称为“新面貌”的防御政策，这一政策着重强调在认为合适的时机，美国将承诺使用核武器。

作为大商人党派的共和党人热衷于减免税收和平衡预算，其主要途径就是削减国防开支。同时，他们又都赞同更富进取性的对外政策。走出这一困境的办法只能是绝对地依赖战略核力量。用那时的话说，就是这一政策将给“雄鹿以更加猛烈的一击”。

然而，美国的对外政策往往言行不一。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内初期的三次冲突——朝鲜、印度支那和台湾海峡就可以显示出“解放”和“大规模报复”政策是如何被遏制政策所取代的。

我们已经看到，艾森豪威尔以核武器相威胁迫使中国签署朝鲜停战协定，但是他对于核武器的使用还是很有疑虑的。韩国总统李承晚曾希望美国帮助他重新统一国家，当他在1954年向艾森豪威尔提出这一建议时，艾森豪威尔狠狠地给他上了一堂关于核危险的大课。艾森豪威尔回答说：“以我们掌握的（核）武器去打一场战争，这在今天是不可思议的。倘若克里姆林宫和华盛顿都参战的话，其结果将可怕得无法预测，我甚至无法想象结果将是怎么一回事。”

在印度支那（由老挝、柬埔寨和越南三国组成），法国正在与为摆脱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越盟作战。至于这场战斗后来为何演变成越战将

在第四章作探讨，在此，我们只需要提一下美国在 1954 年所扮演的角色。到那一年为止，法国在印支费用的 2 / 3 是由美国支付的。为摧毁越盟的武装力量，法国准备孤注一掷打一场阵地战，它把 1 . 5 万精锐部队驻扎在奠边府。当发觉已深陷泥潭，胜利无望时，法国请求美国提供军事援助。

从一开始起，艾森豪威尔总统就拒绝派遣地面部队，1954 年 1 月，他以预言家的口气对国家安全委员会说：“这场印支战争将把我们的部队一个师一个师地吸在那儿。”海军上将拉德福德和五角大楼建议实施包括使用三种战术核武器在内的“秃鹫行动”，他们认为这样就足以摧毁奠边府的越盟军队。但是，艾森豪威尔并不打算动用核武器。不仅如此，他也不打算在没有国会支持的情况下采取任何行动，他甚至压根儿不想在没有得到华盛顿盟友支持的情况下参与任何调停。英国是美国的主要盟国，1951 年至 1955 年间担任英国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直截了当地表示，他的国家反对参与印支的任何军事干预。1954 年 5 月 7 日，奠边府失守。显然，“新面貌”战略没能用在印支战场上。

“新面貌”战略遇到的第三个考验来自 1954 年和 1955 年的台湾海峡。为准备武力攻打台湾地区，共产党中国不断炮击位于中国海岸之外，属于台湾国民党政权的两个小岛— 金门和马祖。海军上将拉德福德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用原子弹对付中国。艾森豪威尔再次拒绝了这一核

选择建议，其理由是，核武器限制不了这一类行动。所有三次危机——朝鲜、印度支那和台湾海峡——实际上表明艾森豪威尔只是在表面上与杜鲁门的战略不一样，尽管口头上高唱“大规模报复”的调子，其推行的还是自我威慑政策。

在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内，占其对外政策主导地位的是寻求和平。1952年他当选的前3天，美国在太平洋上爆炸了第一颗氢弹。这颗氢弹的爆炸威力几乎相当于用于摧毁广岛的炸弹总威力的1000倍。在这样的时代中，当一架美国轰炸机携带的摧毁力就远大于迄今为止整个世界历史上的爆炸总当量时，艾森豪威尔确实清楚有必要把核时代的真实情况告诉美国人民。1953年，苏联在西伯利亚也爆炸了自己的第一颗氢弹。

在50年代，苏联领导人很清楚热核武器那可怕的强大威力，他们认识到在一切冷战理论的背后，美国人是多么地害怕使用核炸弹。但是，需要搞清的是，50年代中期的“和平共处”岁月为何以及如何突然中止，接踵而来的是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对抗阶段，并最终导致了1958年至1962年的柏林危机和古巴危机。

斯大林之后的“解冻期”（1953年-1956年）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苏联领导集团陷入一片混乱。集体

领导层的内部出现了权力大争斗，没有哪一个人有能力足以左右苏联的对外政策。在这个政权空白期内，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曾试图为缓和与西方的紧张关系作出努力。1955 年赫鲁晓夫作为苏联领导人上台执政。

直到他 1964 年下台为止的接下来的 10 年内，赫鲁晓夫注定要成为举世闻名的非斯大林化以及“和平共处”理论的第一人；但是，西方始终没能真正搞懂他的所作所为究竟出于什么动机。因为正是这位大声疾呼要与美国“和平共处”的人却在柏林和古巴危机中把世界推到了核战争的边缘。经常有人不假思索地设想，既然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主义，那么，他必然是倡导与西方缓和的自由派人士，然而，从以下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这是一种谬误。

赫鲁晓夫相信，欧洲的局势已经稳定，因而苏联可以放松对诸如奥地利、芬兰这样一些无关紧要地区的控制，而继续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去维持社会主义阵营。1955 年苏联撤离奥地利——它和德国一样，一直被四大国所占领——其条件是奥地利永远保持中立。同一年，苏联人重返战后夺到手的芬兰波卡拉海军基地。1955 年日内瓦首脑会谈虽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但是它标志着苏联结束了长期孤立于世界事务之外的状况。“旧内瓦精神”因此成了当时耳熟能详的词语。

标志着赫鲁晓夫与过去彻底决裂的是他于 1956 年 2 月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谴责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他修正了列宁关于战争、资

本主义和革命的有关观点，从而把苏联的对外政策引入一个新纪元。他否定了列宁关于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战争不可避免的论点；他在核时代中呼吁两大阵营之间应“和平共处”。在社会主义阵营内，赫鲁晓夫允许“各国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可以各不相同。此后，1956年在匈牙利发生的起义与这篇讲话有着直接的关联。

1956年6月，波兰刚发生动乱之时，波兰政府没向莫斯科求援就自己恢复了秩序，更有甚者，他们还将之前遭亲苏傀儡政权囚禁的象征民族主义的共产党人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选为波共第一书记，事前也不征求一下莫斯科的意见。对此，苏联没有对波兰进行军事干预，这是因为，波兰共产党与苏联结盟这一点是坚定不移的。匈牙利则不同，新总理伊姆莱·纳吉先是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尔后宣布结束一党制并退出华约。这意味着对苏联的利益构成了直接的威胁，于是，11月4日，苏联坦克开进了布达佩斯。到11月7日，这场革命宣告结束，3万多匈牙利人丢了性命，纳吉被捕后处死。赫鲁晓夫对匈牙利起义实施武力镇压表明了苏联对共产党集团内的政治多元化的容忍限度。南斯拉夫和波兰的所作所为在斯大林时代之所以尚能被容忍，是因为这两个国家虽然采取了一种民族主义的、非苏联的模式，但毕竟仍坚持了共产主义的体制。而在匈牙利，这场起义却是一场以推翻一党专政为目的的民众性反共叛乱。

就在苏联镇压匈牙利叛乱的同一个星期，英法纠集以色列向埃及发动进攻，因为埃及响应纳赛尔上校的号召，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仅在1年前，赫鲁晓夫与纳赛尔进行了一笔军火交易，使苏联第一次以一个强国的面貌出现在中东。尽管英法入侵在军事上取得了一时的胜利，但是，美国拒绝对其盟友的支持，苏联的威胁以及世界各国的谴责使得英法联军不得不很快地撤出该地区。

在国际政治中，1956年是一个分水岭。西方体制和苏联体制都在各自的脆弱点上遭受到狠狠的冲击。英法入侵苏伊士遭遇危机一事标志着英法帝国强权的结束，在中东留下了一个权力真空，这一真空将由美国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由苏联去填补。苏联警告英法不要在侵埃路上走得太远，这标志着苏联在中东成了一个不可等闲视之的大国。在东欧，苏联恢复了它的平静，至少它有能力去维护苏联帝国表面上的一致。

核对抗年代:柏林和古巴(1957年—1962年)

从1957年至1962年的这段时期一直被称为“核纪元”，在此期间，爆发核大战的危险不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而且比那时以后的任何时候也都大。1957年10月4日，苏联把第一颗“伴侣号”人造卫星送入地球轨道。这一惊人的科学成就使美国警觉起来，部分原因是这一成就所具有的军事意义。如果苏联人手中有了能把卫星送入轨道的火箭，那

么，他们就能生产出有巨大冲力、装备着可瞄准美国任何目标的核弹头的洲际弹道的火箭。刹那间，苏联看来已经改变了东西方之间的战略平衡。

苏联在导弹技术上令人瞩目的领先地位所形成的外交优势立即被赫鲁晓夫加以利用。举例来说，他打算通过威胁西德和英国，说它们将如何“从地面上被消灭”，试图把这两个国家赶出北约。毫无疑问，对这些公开恫吓，英国在 1958 年组织了核裁军运动，作为回应苏联的一个措施。事实上，所谓有利于苏联的“导弹差距”后来被证实是骗人的鬼话而已。直到 1960 年，苏联一共才有 4 枚洲际弹道导弹和 145 架远程轰炸机，而美国在整个 50 年代就具备了核战略的绝对优势。

实际上，赫鲁晓夫只能根据实战未必会发生的设想去耍弄他的外交手腕。他注意到，美国对日内瓦首脑会谈、匈牙利革命、苏伊士危机和台湾海峡的所作所为表明美国极不愿意拿核大战去冒险。在国内，赫鲁晓夫的地位不稳，经济出现了麻烦，他亟需在对美政策上取得成功。确实，1958 年至 1962 年间，他在对外政策上作出的冒险部分原因应归于苏联整体上的弱势而非强势，特别是赫鲁晓夫本人更是如此。

柏林（1958 年-1961 年）

1958 年 11 月，赫鲁晓夫向西方大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它们结

束对西柏林的占领，把柏林变成一座“自由城”，从而引发了一场柏林危机。如果西方到 1959 年 5 月还不与莫斯科签署一项新的条约的话，苏联就将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单独签约，这意味着苏联将把通向西柏林的所有通道交由民族德国控制。苏联外长安德烈·葛罗米柯警告西方说，针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任何行动都可能引发“一场大战，在这场大战的炼狱中，数千万人将惨遭毁灭”。看来西方面临两种选择：要么撤出西柏林，要么与苏联干一仗。

自 1955 年以来，德国本身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联邦德国加入了北约，眼下德国重新统一的所有希望化为了泡影。莫斯科接受了一个分裂的德国，现在又急切地追求下一个必然结果——这就是让西方也承认民主德国。西方拒不承认民主德国政权是因为在它们看来，民主德国从未举行过自由选举。西方仍寄望于未来能重新统一德国，因此西方不想使这一现状合法化。然而，苏联除了想得到西方对民主德国的承认外，还想斩断联邦德国与美国的联系，这一想法在 50 年代后期几乎成了赫鲁晓夫的一块心病。

现在，苏联既然有了足够的核力量，赫鲁晓夫就准备着手解决柏林问题了。民主德国、联邦德国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在 50 年代，联邦德国经济欣欣向荣，反之，民主德国经济却徘徊不前。柏林在“铁幕”上相当于一个洞口，从 1949 年至 1958 年，共有 210 万民主德国

人逃往联邦德国（1949 年民主德国总人口为 1700 万）。但在军事力量上，苏联占有绝对优势：西方在柏林的驻军总共才 1.1 万，而在柏林城外包围着他们的是 50 多万东方集团的部队。西方拒绝就柏林问题作出让步，1959 年 3 月，倒是赫鲁晓夫作出了他的第一个让步，即取消把 5 月 27 日作为最后通牒的期限。莫斯科和西方都意识到，使用武力是不可想象的，一旦使用，就可能很快升级为一场大规模的核战。因而，在其后的 2 年中，柏林问题处于相持状态。在此期间，赫鲁晓夫访问了美国，但更要命的是，他遭到了中国对他执行修正主义对外政策的严厉批评。始于 1959 年的苏中分裂对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产生了直接影响（参阅第五章），他比以往更需要从外交上战胜西方。1961 年夏，赫鲁晓夫相信，他考验美国新总统决心的时机到了。肯尼迪刚刚经受了猪湾事件的挫折（1961 年 4 月），那时，一群受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古巴流亡者企图推翻古巴的卡斯特罗政权，但遭失败。柏林危机也正在迫近，这年 7 月，1 天内就有 1000 多民主德国人抵达西柏林，这主要是担心赫鲁晓夫有可能掐断所有通往西柏林的通行点。当民主德国于 1961 年 8 月 13 日筑起柏林墙时，这个问题终于有了一个戏剧性的“结局”。

柏林墙一下子解决了逃亡问题，但同时这成了在苏联势力范围内实行镇压的一个象征。当赫鲁晓夫不再威胁要与民主德国单独签署什么和

约以后，柏林危机也告一段落。他最终未能把西方驱逐出柏林，反而受到中国对他投降资本主义强权的猛烈抨击，赫鲁晓夫仍需要对外政策上的胜利。1958年在柏林拉开的那一幕于1962年在古巴闭上了大幕。

古巴（1962年）

1962年10月的13天内发生了冷战期间最为严重的危机。这场危机起源于1962年夏，当时赫鲁晓夫在距佛罗里达海岸仅90英里的古巴岛上部署了进攻性战略中程导弹，10月28日，当他同意撤走这些导弹时，危机才告结束。

1959年1月，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的一支地方游击部队推翻了古巴的巴蒂斯塔政权。此后，卡斯特罗对美国在古巴的企业实行国有化，他与美国的关系趋于恶化。1961年4月受美国中央情报局唆使的猪湾入侵失败后，卡斯特罗转向莫斯科寻求军事保护。当一架美国U-2侦察机于1962年10月发现部署在古巴的苏联导弹装置后，肯尼迪总统下令进行海上封锁，以阻止任何导弹继续运进古巴。然后，肯尼迪要求苏联从古巴撤走所有进攻性导弹，否则，美国在24小时内将派兵入侵古巴。在进行了一系列复杂的信件交换后，苏联同意撤走导弹，作为回报，美国承诺不入侵古巴。

对于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表现，可以用很多理由进行解

释，其中似乎最有道理的是他希望把苏联与西方之间存在的核不平衡态势一下子就调整过来。危机发生时，苏联只有数量很少的洲际弹道导弹，而美国配备在北极星潜艇上的导弹就有 144 枚，此外，还有 294 枚洲际弹道导弹。苏联把较为低廉的中距离和中程导弹部署在古巴是想花费相对小的代价提高它的第一次核打击能力。总之，在古巴部署导弹可以视为“快速修补”，代替不了长期性的洲际弹道导弹集结，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古巴导弹危机是赫鲁晓夫对外政策的最后一招，事实证明，对他来说，这是一场永难复元的灾难。无论对莫斯科还是对华盛顿而言，这一事件标志了核边缘政策紧张期的结束。1 年内，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就签署了三项重要的军控协定。1963 年 6 月，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建立了“热线”电话的直接联系；1963 年 8 月，美、苏、英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导弹危机最终促使两个超级大国于 1969 年同意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第四章 美国和印度支那（1945 年-1975 年）

越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战——争。尽管战争的激烈程度和作战的重点各不相同，这场战争从 1954 年持续到 1975 年，美国为此花费了 1500 亿美元，投入了 270 万兵力，在越南投下了 100 万吨炸弹——其总数超过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投掷炸弹的总和。北

越敌军共损失 90 余万人，而美军阵亡人数为 58000 名。但是，美国仍然输掉了这场战争，这是为什么？

美国为什么要对远在万里之外的一个落后的小国承担如此巨大的义务呢？一位名叫乔治·保尔的美军高级军官此后把作出卷入越南的这一决定称为“也许是美国在历史上犯的最大的一个错误”。20 多年来，美国一直把将南越从共产主义阴影下解放出来作为自己的一个目标，美国并没有“盲目地”卷入战争，每深入一步之前都作过大量的思考和权衡。就是这样，美国仍然输掉了这场战争，并不得不在 1975 年声名狼藉地撤离越南。

研究越战的后果与研究它的起因同样重要。战后，西方有很多人认为美国比苏联对世界安全更具威胁。反战论点引起了一场大辩论：美国卷入越南，说得好听点，是犯了一个大错，说得不好听，那简直是犯罪。

在以下的几节中我们试图来回答三个问题：为什么美国要卷入越南？为什么美国要呆在越南？为什么美国要撤出越南？

美国卷入印度支那的根源(1945 年— 1961 年)

1945 年 10 月，法国重返并控制了印度支那，随即遇到了曾经经历过抗日，现正争取越南独立的胡志明领导的越盟反抗运动的抵抗。法国

所能控制的只是越南的南部，正因为这样，法国不得不从 1946 年起到 1954 年与越盟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数周后，美国开始支持法国，这场战争现被视为是一场反对共产主义的战争。

艾森豪威尔政府把胡志明看作是国际共产主义的工具，并声称：“丢失”印度支那将在东南亚其他地方引发灾难性的后果。于是，就产生了许多多米诺理论——这一理论后来遭到越战反对派的冷嘲热讽。然而，正如我们在第三章所看到的，艾森豪威尔既不想派遣地面部队，也不想动用核武器去援助在越法军。1954 年 5 月，法军在奠边府被越盟部队团团包围，被迫投降，这一事件标志着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宣告结束。

在 1954 年的日内瓦会议上，越南以 17 度线为界被分隔成南北两部分并决定于 1956 年进行全国选举。1955 年至 1959 年的这些年在越战史上往往被忽略不计，因为无论是北越还是南越（以及它的盟国美国）都没有参与敌对行动。但是完全有理由把这段时间作为弄懂美国在越南究竟要达到什么目标的一个真正的起点，而不仅仅着眼于 1950 年杜鲁门为什么决定帮助法国。

国务卿杜勒斯在 1954 年为这一地区设定了两个目标：其一，在东南亚创建一个类似于北约的条约组织，为阻止共产主义在该地区的蔓延提供一种集体防御机制；其二，在南越成立一个能独立发展的民族国家以抵御来自北方的共产党的威胁。1954 年美国把 7 个国家召集起来组

成了东南亚条约组织，第一个目标完成了。同一年，美国把流亡在美国的虔诚的天主教徒、越南的民族主义者吴庭艳扶上台，当了南越政府的头，第二个目标也完成了。吴庭艳接管的是一个被战争毁坏了的国家，政治上一片混乱。几乎有一百万人逃离共产主义的北方而居住在南方，同时，差不多有十万越盟部队和它们的支持者到了北方。1956年吴庭艳拒不进行选举，因为他担心可能会输给共产党人，他除了镇压之外，没有别的什么办法去解决国家的政治问题。华盛顿甚至考虑不再支持吴庭艳政权。之所以没有这样做的理由，可以从J·F·肯尼迪参议员（日后成为总统）1956年发表的题为《美国在越南的赌注》演说的节选中看出一些端倪：

“越南好比是自由世界在东南亚的一块柱石，拱门上的一块冠石，堤坝上的一块手指状小石料。一旦共产主义的红色浪潮涌入越南，那么缅甸、泰国、印度、日本、菲律宾，显然还有老挝和柬埔寨等国的安全就会受到威胁。”

从1955年至1961年间，美国向越南投入的经济和军事援助高达10多亿美元。这一援助虽然防止了吴庭艳政权的垮台，但是对90%以上的农村人口生活条件的改善几乎不起作用。美国训练南越军队如何打常规战而不是打乡村暴动战。但越南不是朝鲜。在越南，共产党游击队就在南方，它们不断得到北方的支持，它们正是用乡村暴动来反对吴

庭艳政权的。

要搞懂越南战争，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分清共产党反对吴庭艳政权与在南方暴动中北方（包括它的盟友，中国和苏联）所起作用之间的界线。1959年，北越首先向南方的起义者提供有效的援助，这些起义者在1960年组成了以推翻吴庭艳政府为目标的民族解放阵线（NLF）。“越共”这个词是美国人用来特指民族解放阵线的，意思是越南共产党。民族解放阵线的成员以共产党人为主，当时都来自南方，但是此后不断得到来自北方的支援。

1960年，老挝问题较之越南问题看起来更为危险。那儿的亲美政府在1960年被一个所谓的中立团体所推翻。与此同时，在越南南方，吴庭艳使南越陷于绝望，他的消极镇压的一系列政策引发了一场革命。杜勒斯“国家建设”的试验也不起什么作用。1961年1月，当冷战处于最危险的紧张时刻，肯尼迪上台执政。

肯尼迪和约翰逊两总统任内的战争升级策略 (1961年—1968年)

肯尼迪总统把一批年轻有为，富有朝气的积极分子聚集在他的周围——用戴维·哈伯斯塔姆的话就是一片“精英分子”——哈伯斯塔姆相信，1938年慕尼黑绥靖政策的教训同样适用于越南战争。他们争辩说，

正如中国是朝鲜的后台一样，中国现在也在支持越南北方，而中国的后台是苏联。因此，在越南发生的这场战争可以被看作是极端主义侵略模式的变异，而在慕尼黑，西方未曾抵御住极端主义的侵略。

肯尼迪和他的顾问们猛烈抨击艾森豪威尔政府依赖核武器的做法和“大规模报复”战略。他们选择“灵活反应”（即使用常规部队）去对付正在越南实验的更狡猾的共产主义侵略的新样式。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论点，说是美国受了一些军人的蒙骗而不经意地陷入了战争。其实不然。无论是肯尼迪还是约翰逊，都是有意识地实施着灵活反应战略，他们都想在核年代中把战争纳入控制论和模式化的轨道，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战争中的另一方并不按同样的规则行事，这一战略终于破产。

对肯尼迪卷入越南的问题，必须把它放入当时一系列国际事件的前后关联中去加以理解。1961年，肯尼迪新政府在古巴和老挝遭受挫折；8月，民主德国又筑起了柏林墙。此时，总统开始派出军事顾问训练南越军队以便向所谓的“战略村”计划内的越共发动攻击，这一计划的目的是把越共一点一点地消耗掉，用尼尔·希恩的话说就是：“用巴顿将军在欧洲剁碎韦克马克特部队的相同办法去碾碎越共。”尸体数目变成检验胜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试金石。然而，到1963年这一战略显然也不起作用，主要原因是吴庭艳政权因其大肆镇压而失去民心，1963年11月1日，吴庭艳在一场政变中被推翻并处死。3周后，肯尼迪本

人也遭暗杀身亡。当他死的时候，美国的 1.6 万名“军事顾问”还留在南越。

副总统林登·约翰逊接替肯尼迪并在 1964 年的总统大选中获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声称“我们不想再扩大在越南的战争”。然而，在 1964 年 8 月，美国多艘驱逐舰在东京湾遭到北越鱼雷艇的袭击，约翰逊下令对北越鱼雷艇基地和储油库进行空袭，作为报复。更重要的是，他利用东京湾事件使国会以 48 票对 2 票的绝对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授权总统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回击任何武装袭击。东京湾决议的意义在于总统得到了一张空白支票，使其能随心所欲地指挥战争而无需征询国会的意见。1965 年约翰逊开始对北越实施空袭行动以回应北越对驻守在波来古的美国军营进行的攻击，与此同时（1965 年 3 月）首批美军地面部队在岘港登陆以保护那里的空军基地。约翰逊在没有公开宣布他的战争政策的情况下使战争升了级。他之所以这样做，是担心如果在国会内对此进行充分讨论的话，很可能使战争更为扩大。

约翰逊的越南政策是建立在一种未经验证的假设上，即以为一旦华盛顿决定动用它的强大军力时，敌人将会被轻而易举地打败。（一定程度上）正因为如此，约翰逊从来没有针对这一类的战争制定过合适的战略。美国于 1965 年直接参战就是为了防止南越政权的垮台；但是，这也未能使军事力量转化为政治优势，从而在西贡建立起一个有自立能力

的政府。约翰逊想以有限战争去阻止苏联和中国的介入，同时，他希望以速胜去平定国内的不安。然而这些目标自相矛盾，互不协调。一旦战争在 1965 年至 1968 年间开始变得对美国不利，那么，这一战略的失败命运就日益显现出来。

美国军事战略的核心是空军，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空军也显示出它的效果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人们普遍相信，轰炸可以摧毁敌方的军事生产能力，迫使敌方讲和。到 1967 年，北方所有的主要目标（供应点、工厂等）都被炸毁，但轰炸对摧毁北方的作战能力几乎不起作用。所以轰炸被说成是“想用推土机给花园除草”。

与此同时，地面战争的升级在 1965 年至 1967 年之间也很明显。1967 年后期，威斯特摩兰将军要求动用 54 万多的兵力执行“搜索和消灭”任务。但是，在一场没有前线或者明确的领土目的战争中，要想预先推测军事上的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因而所谓的“尸体计数”就仅仅成了衡量进度的一个标准而已。虽然 1:1 的杀伤比例对河内不利，但它却能自主地掌握战争的进度，选择何时何地于敌交战。

1968 年 12 月，当越共向所有南越主要地区发动新春攻势的时候，越南战争到了一个转折点上。新春攻势在军事上是不成功的，但是它取得了心理上的胜利，因为从那时开始华盛顿试图撤出这场战争。1968 年 3 月，约翰逊发表了令人注目的演说，宣布轰炸的限度，向河内提

供一个讨论和谈的机会，他还宣布了不再竞选总统的决定。

尼克松：战争越南化和撤军（1969 年— 1975 年）

新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及其对外政策顾问亨利·基辛格于 1969 年 1 月走马上任。在竞选中，尼克松曾经对他的选民承诺：“我们将结束战争赢得和平。”尼克松和基辛格都担心仓卒撤出越南可能使美国作为一个世界领袖的信誉大受损害。尽管有很大困难，他们也都坚信只要投入足够的兵力，北越会同意接受政治解决方案的。

只要推行战争越南化政策，即让南越越来越多地承担起战争的责任，尼克松就可以着手开始将美国作战部队分阶段地撤出越南。但是，当和谈没能取得突破之时，尼克松在 1970 年向在老挝和柬埔寨的后勤供给线发动了有争议的狂轰滥炸。1973 年 1 月，华盛顿与河内终于达成了一项停战协议。尼克松宣称取得了“体面的和平”，但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比起约翰逊政府来，尼克松执政时期投在印度支那的炸弹要多得多。

越南战争不是因为 1973 年 1 月签署了巴黎协定才结束的，而是因为北越部队于 1975 年 4 月先后夺取了顺化、舰港和西贡。战争越南化政策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南越政权腐败，它已经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

当美国浮出战争泥潭时，其形象在国际上大受站污，在国内，其分裂的程度比冷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深刻得多。

美国在越南的不幸遭遇：一种解释

甚至在 1975 年 4 月 30 日南越政权垮台之前，美国国内关于越南问题的争论已告结束。至少在美国卷入战争的过去 5 年中，只听到为美国进一步参战而辩护的一种声音，但反战的声音赢得了这场争论的胜利。越南成了一项错误的对外政策的象征，这项错误政策的例子一直被称为“强国的傲慢”。更为极端的批评家把美国卷入越南说成能与纳粹德国所犯罪恶相提并论的一项罪行。美国记者弗朗塞斯·菲茨杰拉德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写道，美国轰炸所造成的结果“无异于”种族灭绝。反战批评家无论是政治上还是道义上都赢得了这场争论。

事实上，要想知道美国是如何卷入越南并不是一件难事。美国以为，40 年代后期遏制政策在欧洲能取得成功，那么，这一政策同样也能在 50 年代的东南亚奏效。朝鲜是这两者之间的链结，1950 年，美国防守韩国以反对它所谓的世界共产主义的阴谋。有一种观点很能蛊惑人心，即共产主义坚如磐石，受此影响，华盛顿的决策者们认识不到越南是一个独立的共产党国家这一现实。许多越南共产党人在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就是民族主义者，无论什么时候他们既不是苏联也不是中国的代

理人。因此，所谓在南越“阻止共产主义”这一美国公开宣称的战争目标只不过是一个空喊的口号而已。既然越南共产党人不受苏联或中国的摆布，那么，南越的命运与遏制苏联或中国的共产主义毫不相干。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是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任内的国防部长并参与把美国引入越南的计划。事实上，越战经常被人称为“麦克纳马拉的战争”。30年后，他在题为《回顾：越南的悲剧与教训》一书中把当年驱使美国陷入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中的种种错误判断的内部思考一一写出。麦克纳马拉引用了在肯尼迪任内曾左右政策的两个想法，它们互为矛盾却又未经仔细考虑。一个想法是，南越如落入共产党的手中，美国的安全将受威胁；第二个想法是，只有南越人能够保卫自己的国家，因此，美国应该将对南越的支持限制在提供军训和经援的范围内。

麦克纳马拉承认，他们认为越南的共产党人与50年代在缅甸、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游击队暴乱运动有一定的关系。他们不是把这些冲突看作民族主义运动，而是把它们看作共产党为谋求在亚洲的霸权团结一致开展斗争的一部分。40年代在欧洲，美国承认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是一个独立于莫斯科的共产党国家；在60年代，美国不是把胡志明看作东南亚的铁托，而是在苏联或中国的共产主义轨道内行动的另一个人。

正是按照上述想象行事，所以美国就认不清在越南发生的这场战争

的政治性质。当吴庭艳于 1963 年被推翻后，华盛顿更深地陷在越南南方，全然不接受肯尼迪的观点，也就是只有南越人自己才能保卫他们的家园。约翰逊轰炸北越并向南方派遣作战部队，使战争升级。然而，轰炸北方即使是有效的也无法赢得这场战争，其理由就在于这场战争的根子在越南南方。美国试图以反暴的手段与南方的越共游击队作战，但是它们面对的游击队是难以从其他人群中辨认出来的，因此，不从肉体上把所有人都消灭是不可能消灭游击队的。而且，越共游击队都是一些为社会革命和民族生存而战的宁死不屈的狂热分子。

美国的军事领袖们声称，要不是有地理上的限制，生怕与中国和苏联发生冲突，他们早就赢得这场战争了。在狭义的军事意义上说，这可能是对的，但是，它没有考虑到这样的事实，即战争必须赢在越南南方，而且，最终必须由南越人自己去赢。如果遏制中国和苏联是华盛顿的首要利益的话，那么，不顾一切地倾尽全力去遏制越南的共产党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直到 70 年代初期，华盛顿某些决策者们才清楚地认识到，一味地要在东南亚一个落后的小半岛上赢得战争正是曲解了对外政策目标的初衷——对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大国进行全球性遏制。越战期间，中国取代苏联而成为华盛顿眼中的头号共产主义敌人。然而，正如我们在第五章将看到的，在越战自然向前推进之前，中国和美国将进入历史上的友好时期。

第五章 处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中国 (1949 年—1980 年)

“半个超级大国”的中国

1949 年后，中国的对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这个国家在上一世纪遭遇的影响。毛泽东

希望 1949 年以后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关键作用，但是他对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看法是建立在 20 和 30 年代形成的两个理论观念之上的。

第一个是“半殖民地”的理论。中国作为列强关注的目标在世界上确实处于一个较有利的地位，如果它只是某一个大国的殖民地，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当中国在 60 年代的国际环境中处境孤立的时候，毛泽东再次提醒他的同事们说，现在有两条狗（美国和苏联）正在为争一夺中国这根肉骨头而打得不可开交，正因为两家都在争，所以哪一家也得不到。

第二个是“中间地带”的理论。毛泽东坚持认为，真正的冷战争斗不是发生在处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欧洲，而是在亚、非、拉广阔的“中间地带”，那是一场革命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在 50、60 年代，中国应该在支援第三世界国家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发挥主导作

用。这是毛泽东否认苏美斗争重要性的主要思路。

毛泽东的上述两个观念来源于中国长期依赖外国列强的历史教训。1949年后，中国外交继续取决于两个超级大国的政策，或者说只是对此作出的反应。与美苏两国相比，中国自然是弱小的。但约翰·吉廷斯始终令人信服地把中国描绘成“半个超级大国”。更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中国弱小，然而在1949年后的国际事务中，它有能力保持行动的自主权。

中国是4个独特的国家，只有它才可能去影响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均势。50年代，它是苏联的亲密盟友，70年代，它却与美国发展友好关系，在60年代中，它通过支援第三世界革命运动而向国际秩序进行挑战。尽管中国只是一个影响有限的地区性大国，然而，它是惟一一个成功抵挡住了两个超级大国入侵的国家。

50 和 60 年代的中美对抗

中美对抗的核心所在是台湾问题。1949年美国承认并支持在台湾地区公开叫喊反攻大陆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此外，美国还支持诸如韩国、日本、菲律宾、泰国和印尼这样一些处于环太平洋圈上的反共政权，并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

朝鲜战争是一帖催化剂，它促使美国把台湾地区变成一个主要的军

事基地，还把遏制政策扩大到环太平洋圈。1951年，华盛顿与台湾地区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承诺“当台湾受到可能的攻击时”，美国将向国民党政府“提供军事物资以保卫台湾”。尽管规定援助只能用于防御目的，但是美国允许国民党军队对一些外海岛屿获得有效控制。

为回应华盛顿对台湾国民党政权的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54年和1958年对一些外海岛屿实施猛烈的炮击。虽然中美从未为了台湾地区而兵戎相见，但是北京仍把“解放”这个海岛作为自己的目标。基于朝鲜战争的经验和华盛顿继续支持台湾蒋政权的事实，北京当局相信，美国千方百计地想孤立和颠覆人民共和国。而美国把中国视为东南亚和第三世界颠覆活动的主要怂恿者和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新领袖，是一个“国际不法之徒”。中国还坚决反对苏美之间一切规范核军备竞赛的企图，由此，中国得到了一个不負責任的名声。

不管怎样，中国还是极为谨慎地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对抗。在越战中，中国给予越南北方道义和物资援助，但声明除非美国进攻中国或侵入越南北方，否则中国不会卷入战争。不论中国用了多少革命的辞藻，它的行动是慎重的。实际上，因为中国感到自己正受到昔日盟友苏联日益严重的威胁，到6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向美国靠近。

中苏同盟及分裂（1950 年—1969 年）

1949 年除了“一边倒”向苏联以外，毛泽东几乎没有别的选择，那时，苏联毕竟是世界上另一个主要的共产党大国。1950 年 2 月，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个条约包含了一个为期 30 年的针对日本或任何一个日本盟国的军事同盟以及一项 3 亿美元的对华低息贷款。然而，到 1960 年底，苏联撤走了所有在华的技术和经济顾问，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互相公开谴责对方，这一同盟就名存实亡了。1960 年的中苏交恶给冷战中的国际关系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中国对 50 年代从苏联得到的援助表示不满，但更重要的是，1958 年苏联拒绝向中国提供核能力。莫斯科也许愿意在中国建造核武器，但条件是，这些核武器必须由苏联控制。1958 年的台湾危机使关于核武器的冲突更为突出，当时，苏联明确要求中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把这场危机发展到迫使莫斯科动用核威慑力量的地步。于是，中国得出的结论就是必须发展自己的核威慑力量。当时苏联是一个拥有核武器和公认的超级大国地位的工业化国家；相比之下，中国却是一个军事能力有限、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而且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与美国有着直接的冲突，在第三世界中还有一些革命的任务要承担。当 1959 年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会晤时，中国认为苏联正与共产主义的大敌美国进行调停。

中国不再对苏联存有幻想一事，只能放在 50 年代后期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分歧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去理解，关键一年是 1956 年，因为那一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对斯大林发起了世人共知的谴责，后来又倡议与美国“和平共处”。中国人对赫鲁晓夫在未经与他们磋商的情况下对共产主义正统观念作出大转变极为恼怒。赫鲁晓夫宣称，在核时代，有必要修正列宁主义关于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并与美国这个资本主义魔鬼谋求和平共处。中国作为仍信守以革命求改变这一规则的愤愤不平的大国，猛烈抨击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对外政策是对社会主义原则的背叛。

1958 年中国着手一种新的经济政策——大跃进，其目标是通过建立起巨大的人民公社激发人民的活力，从而减少对苏联的依赖。那时，中国自以为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它的意识形态是最正确的。1960 年苏联以突然从中国撤走一切经济援助作为回应，中苏论战变成了公开的决裂。在 60 年代三次互不相干的危机的影响下，中苏关系达到了一个破裂点。这三次危机是：古巴导弹危机（1962 年）、中印战争（1962 年）和中苏边界冲突（始于 1964 年）。由于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向美国屈膝“投降”，中国更加确信莫斯科一再也不会甘冒与对手对抗的风险了。1963 年华盛顿与莫斯科签署的禁止核试验条约规定禁止在大气层中进行核试验。中国拒绝签字，不但如此，1964 年 10 月，在没有苏联援

助的情况下，中国还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另一个中苏冲突的原因出现在 1962 年，中国与印度边境战争期间。莫斯科虽然在中印冲突中持中立立场，却履行了向印度提供喷气式飞机发动机的承诺。

北京与莫斯科之间敌对态度的一个最重要的来源就是它们之间的边界争端。这一边界之争发端于 1964 年，到 1969 年，这一争端差一点就演变成一场战争。苏联占领了沙皇俄国 19 世纪从中国掠夺来的 10 多万平方英里的领土，中国坚持两国的边界必须重新划定。在中国西北省份的新疆，这一紧张局势达到了顶点，两个共产党大国间的边界冲突频频发生。

中国发现自己的处境特别容易受到攻击，苏联人有能力在中国力所不及的边界地区集结大量的部队（包括核武器）。在文革期间——1966 年至 1969 年中国国内发生意识形态和政治动乱的年代——中国非常敌视苏联。当苏联在 1968 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中国对苏联的恐惧到了极点。莫斯科用勃列日涅夫的教义为它的行为辩解，勃列日涅夫教义宣称，苏联有权对任何被认为是偏离正统路线的共产党国家进行干涉。到这个时候，在西北的中苏边界双方的卫兵之间经常发生摩擦。1969 年 3 月，一队中国士兵和在乌苏里江达曼斯基岛（中国称之为珍宝岛）上的苏联巡逻兵发生冲突，这一事件引发了双方大规模的军事摩擦——他们曾在最近距离内倾全力打了一仗——正如我们在下一节将看到的，

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促使中国在 70 年代与美国建立友好关系。

与此同时，中国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采取了一种超然的立场而积极支援“中间地带”或者说第三世界的解放战争。中国在 1955 年于印尼万隆举行的首次亚非会议上就已开始取悦第三世界。实际上，中国对世界革命事业给予的支援大部分是口头上的，它对“人民战争”作出贡献的一个地方是越南。

1965 年当美国开始将地面部队投入越南的时候，中国立即作出反应，它派出了以工兵为主的约 5 万人的部队开赴越南。但意味深长的是，相比于 1950 年在朝鲜出现的类似情况，中国对美军在越南的存在，作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那时中国与苏联结盟。而在 60 年代后期，中国拒绝理睬苏联。诚然，中国继续蔑视两个超级大国，即使在越战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也是如此。中国非但没有与莫斯科修复关系，反而更加靠近美国，尽管美军那时还驻扎在越南。

三角外交：70 年代的中国、苏联和美国

60 年代后期，中国的对外政策出现了一个巨人的变化，这一变化仅用苏联的威胁是不足以解释清楚的。迈克尔·亚胡达曾把 1968 年称为“国际政治中的一个主要转折点”，因为那一年美国从越南战争中撤出，这一行动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正如我们在第四章已经知道的，约

约翰逊总统在 1968 年 1 月新春攻势后就拒绝把战争升级并宣布他本人不再连任。这两个事件——美国不在越南搞战争升级以及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在毛泽东看来，意味着美帝国主义处于守势，而苏联帝国主义正处于攻势阶段。因此，对中国来说，主要危险不是来自美国而是来自苏联。

与此同时，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正在发生变化。1969 年至 1972 年间，世界上有 32 个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惟一的合法政府。1971 年，中国进入联合国并取得了安理会常任国的席位。在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尼克松政府急于从越南撤军，但还不想破坏亚洲的力量均衡。美国与中国及苏联建立三角关系，目的在于想从两个共产党大国的争吵中获得外交上的有利地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尼克松政府相信，中美建立友好关系将会迫使莫斯科对诸如裁军、军控和欧洲安全等一系列问题作出较为积极的反应。

中美两国前后花费了 3 年时间（1969 年—1971 年）才建立起友好关系。这个过程相当错综复杂，有人曾把这个过程比喻为政治版本的“求婚仪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很多的劝诱工作需要秘密地去做。尼克松总统于 1972 年 2 月对中国进行的历史性访问也许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政策一个最富有戏剧性的转变。两国同意保持密切的外交接触，但这还不是正式的外交关系；华盛顿与北京均放

弃在东亚谋求霸权的野心。但台湾地区仍然是美中恢复正式关系的一个主要障碍。但是，华盛顿同意分阶段地从台湾地区撤走所有美国驻军和军用设施，中国也没有给何时解决台湾问题设定时限。

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第三方大国的崛起打乱了美苏之间的两极关系，从而在冷战中引进了一个“大国三角”。中国虽然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实力不强，但从60年代后期以来，它成了苏联攫取政治和战略利益的主要障碍。苏联现在面对的不是一条，而是两条敌对阵线。中国把华盛顿和莫斯科拉入这三角关系中来，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减少苏美之间的勾结，而使自己摆出一副准备与美国共谋的样子去遏制住苏联的扩张主义。中苏分裂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因为它打破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如磐石的神话。

说来也怪，中苏冲突所产生的震荡力比苏美冲突更为强烈。这是因为，美苏之间没有共同的边界，而中苏之间却横贯着世界上最长的边界；苏美冲突仅仅只有三十几年的历史，相反，俄中之间对抗起始于19世纪中叶沙俄向远东和中亚的扩张。更重要的也许是，中苏争吵包含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因素，因而更显得特别激烈。

中苏冲突可以比作是两个敌对教会间的对抗，各方均声称自己代表真理而对方是异教。毛泽东的中国指责苏联的“修正主义”偏离了社会主义信仰；苏联则指责中国在核时代执行了一条与资本主义的西方相对

抗的、危险的，甚至是失去理性的政策。无论是莫斯科还是北京，谁都不愿放弃在共产主义阵营内充当领袖的最高权力。在 70 和 80 年代中，不是北京“打美国牌”去对付苏联，就是华盛顿“打中国牌”去对付苏联，这就是那个年代中三角政策的主要特征。

第六章 70 年代缓和的兴盛和消退

苏美建立友好关系（1967 年—1972 年）

到 60 年代后期，苏联的内外政策面临着一系列问题，从而迫使苏联不得不设法密切与美国的关系。首先，苏联的经济停滞不前。50 年代，苏联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 6 % 以上，但到了 60 年代末，却回落到 4 % 以下。在不改革体制的情况下，提高生产率只有一条途径，那就是从西方进口技术并扩大与西方的贸易。第二，苏联与中国的关系日益紧张，这是使莫斯科谋求与西方缓和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在第五章我们已经看到，60 年代初的中苏分裂到 1969 年差一点酿成一场战争。对莫斯科来说，最关键的是要阻止中国与西方发生关系，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与西方自谋缓和。

促使苏联与美国建立良好关系的第三个因素是出于避免一场核对抗的需要。在这里，走向缓和的动力不是因为出现了问题，恰恰相反是因为取得了成就——到 60 年代后期，在战略核均势方面，苏联已经与

美国基本上旗鼓相当。举例来说，到 1971 年，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数量为 1300 枚，已超过美国 1054 枚的总数。美国虽然在许多其他武器方面仍然独占鳌头，但是昔日核优势的绝对地位已风光不再了。于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怪事出现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第一次有可能坐下来就真正的军备问题进行谈判。而以往在军备控制上所作的多次努力终归失败是因为美国总想把苏联的军力永远冻结在一个对苏不利的水平上。

到 60 年代后期，美国也同样准备实施缓和政策。尼克松在 1969 年 1 月他的就职演说中宣布：“在经过一个时期的对抗之后，我们正进入一个谈判的年代。”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有点出乎意料，作为一个强硬的反共人士，尼克松毕竟在国内已经奠定了他的政治生涯，何故在对外政策上却把缓和放在了一个令人瞩目的位置上呢？要理解这个问题必须从国际体系的一系列变化中去寻找它的来龙去脉。

当时尼克松政府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结束越战而又保持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同时在国内再也听不到对遏制政策的一片赞扬声的情况下继续与苏联竞争？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呼吁“从哲学上深化美国的对外政策”，他的意思是根据已经变化了的国际秩序进行政策调整。基辛格说，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过于关注在一个相当孤立的地区——越南——取得胜利，却牺牲了全球力量均衡的利益。当今的世界正在从华盛顿与莫斯科两极均势格局转为五大经济和战略中心即

美国、苏联、西欧、日本与中国共享的多极均势格局。

尼克松和基辛格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致观点意味着在对外政策上将淡化意识形态的作用，并承认军事实力在世界事务中不总是起到决定性作用。但是，就像 40 年代的乔治·凯南那样，基辛格谋求对苏联施加影响。对美国人来说，缓和不代表遏制政策的结束，相反，用 J·I·加迪斯的话来说，“这是让遏制政策现代化以重新焕发活力的一种手段。”如果认为莫斯科与华盛顿都是用同一种思路去理解缓和的，那就错了。我们在下面将看到，美国是把缓和看作是惩戒苏联军事力量的一种手段，而苏联是把缓和看作扩展力量的一个绝妙良机。

缓和如火如荼（1972 年—1974 年）：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和欧洲的缓和

在 1972 年至 1974 年间莫斯科和华盛顿一共举行过四次首脑会谈，从而把缓和推向了顶峰。军控问题是缓和进程中的核心问题；尼克松与基辛格坚持认为核武器够用就行了，不必追求优势，因而，华盛顿的核武器政策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 60 年代中，苏联已经发展了它的进攻性战略武器，美苏双方现在既担心军备竞赛将付出高昂代价，又担心谁都无法在某一特定领域内占据决定性的领先地位。开始于 1969 年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是为了控制军备而不是为了裁军。在两个超级大国

都可以用自己的核武器完全彻底地摧毁对方的年代里，双方所使用的战略就是威慑战略，军备控制是保持威慑的稳定性，使其免受威胁的一种方法，这种威慑的稳定性是伴随着武器的发展而产生的。

计算机化的制导系统一旦与带有多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联系起来，就可以摧毁敌方的陆基洲际导弹。反弹道导弹是一种保卫城市免遭攻击的防御性武器，因而，它打破了 50、60 年代作为威慑基础的相互确保摧毁的旧教义。最后，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的发展使得战略平衡岌岌可危。带有一个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弹头的导弹可以同时向多个不同的目标分别发射十多枚核武器。

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于 1972 年结束，此次谈判没能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达成一个全面协议，但是却签署了两项临时协定。第一项是关于在 5 年内不发展进攻性战略武器发射架的协定（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限制在 1054 枚，苏联限制在 1618 枚；美国的潜艇发射弹道导弹限制在 656 枚，苏联限制在 74 枚；远程炸弹的数量美国为 455 枚，苏联为 140 枚）。第二项协定规定双方可部署两个反弹道导弹的防御系统，每个系统所配备的导弹发射器不得多于 100 个。

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因没有对美苏提出足够严厉的限制措施而广受批评。比如，反弹道导弹系统只限制双方各拥有两个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每个系统不得带有 100 个以上的导弹发射器而已。其中

的一个系统用来保卫各自的首都（莫斯科或华盛顿），另一个系统用来保卫主要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场。但事实证明，哪一方都没打算在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允许的范围外再建造一个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此外，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被说成是“严重的失败”，因为它没有把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的发展问题包括在内，所以美国和苏联都先后继续部署此种武器。不过，莫斯科和华盛顿达成一项武器协定的本身毕竟是谈判的一个成就，第一阶段谈判也开始了使军控制度化的进程，确定了苏美两国的核平等地位，从而使这两个核大国之间的紧张局势趋于缓和。

欧洲的缓和

欧洲的缓和与超级大国之间的缓和虽然紧密相关，但起源不同——欧洲的缓和主要源自于联邦德国而不是美国。1969年10月，社会民主党联合自由民主党首次赢得联邦议会的多数席位，威利·勃兰特成为新总理，这标志着联邦德国政策向左转，也标志着联邦德国政策即将与下台的基督教民主党严厉的反共政策分道扬镳。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寻求消除两个德国国家之间的屏障，进而总体上促进东西欧之间更合乎人情的接触和经济联系。勃兰特相信，哈尔斯坦主义——声称凡承认民主德国的国家，联邦德国一概不予承认——所起到的效果不是孤立民主德国，恰恰孤立了联邦德国本身。对苏联来说，欧洲缓和的主要目的是赢

得西方对德国分裂和对东欧领土现状的承认。

1970年8月，苏联与联邦德国签署了《莫斯科条约》，这个条约几乎就是一个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和平条约。值得一提的是，1945年未曾签订过正式的和平条约以结束德国和西方盟国之间的战争状态。按照这个条约，联邦德国确认德意志民族分裂为两个国家的现状，正式接受战前德国东部土地已划归波兰和苏联的现实。这一条约是勃列日涅夫的胜利，因为苏联在德国的地位得到了西方的承认，从而开创了一个欧洲缓和的时代。

柏林问题在四国签署的《柏林条约》（1972年）中已经解决，莫斯科承认联邦共和国可以与西柏林保持并发展一种特殊的纽带关系，这是勃兰特东方政策的胜利。苏联承认柏林的现状，从此再也不会要求西柏林成为一个独立的城市或者威胁联邦德国把通往民主德国的所有通道交给民主德国。1972年12月，在联邦德国尚未在外交上正式承认民主德国的情况下，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签署了《基础条约》，接受在德国土地上存在着两个德国国家的现实。

威利·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对缓和欧洲心脏地带的紧张局势影响颇大。但是，苏联却急于解决德国问题以外的其他问题，寻求西方承认东欧各国的合法地位并接受该地区的现状。在赫尔辛基举行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上产生的不是一纸和平条约，而是一份意向宣言，这就是众

所周知的《赫尔辛基协议》。《赫尔辛基协议》中最有争议的一个部分就是呼吁签字国尊重人权的所谓“三个篮子”。

由于1968年发生了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赫尔辛基会议的批评者感到很难同意《赫尔辛基协议》的许多条款，勃列日涅夫主义却竭力为侵捷事件以及东欧集团国家不光彩的人权记录辩解。看来，西方除了从苏联那里得到保证行为良好的含糊不清的承诺以外，什么也没有得到。当东欧集团政府在处理人权问题上没有任何实质性进步的时候，西方立即出现了一股不信任缓和的情绪，这在下一节中我们将会看到。

缓和趋于消亡

缓和本身充满着很多矛盾，无论是华盛顿还是莫斯科都不想承认这一点。莫斯科只想得到西方在军控、贸易和中亚问题上的合作，而不打算接受其他地区的现状。苏联意图把它的影响扩展到第三世界去，在那里，缓和遇到了挑战。

第一次真正的挑战来自1973年10月赎罪日期间叙利亚和埃及袭击以色列而引发的中东战争。正巧苏联在此之前把它的军事人员撤出埃及，人们于是怀疑苏联早就得知此事。而仅在数月前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刚签署了一项协议，规定各方必须把可能发生危及世界和平的任何冲

突通报对方。诚然，那场危机没有演变成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战争，但是，西方，特别是美国，对缓和的信任产生了动摇。造成缓和趋于消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 70 年代苏联在非洲奉行积极进取的政策。1975 年，葡萄牙一个最大也是最富裕的殖民地安哥拉在争取独立的浪潮中因内战而分裂，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之所以稳操胜券，正是因为它得到了苏联大量的军事援助（以坦克、飞机和火箭发射器的形式）和 1.2 万多名古巴作战部队的支援。共产党如此大规模地对非洲进行军事干涉，这是第一次，这在美国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响。1974 年 8 月在尼克松之后继任的福特总统禁止在他的政治词汇中出现“缓和”这个词。苏联和古巴在 1977 年再次干涉非洲事务，这次它们支持埃塞俄比亚把索马里赶出欧加登地区。苏联卷入的规模之大引起了华盛顿的警觉，再加上苏联在其他地区的作为，更使人感到好像莫斯科正忙于在一条辽阔的战线上进行一场地缘政治的攻势。举例来说，1975 年苏联军队曾帮助北越战胜了南越；1979 年，北也门也是在苏联军队的帮助下战胜了南也门。卡特总统的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把苏联的地缘政治攻势称为“危机的弧光”，但是人们不太清楚莫斯科究竟是出于一种宏大的设想才这样做，还是仅仅对互不相关的地区争端作出机会主义的反应而已。然而，无论如何，美国在越战后对到国外冒险所表现的厌恶情绪被苏联充分地利用了。

苏联和古巴卷入非洲之角事务的行动激起了美国国内舆论对卡特总统对外政策的批评，指责他没有与苏联展开更为激烈的竞赛。在越战和水门事件后形成的一片反战反政府的声浪中，南方的民主党人吉米·卡特于 1977 年上台执政。但是卡特的自由主义主张在美国政策较长时期向右转的过程中只是一个短暂的空白期。赞成恢复传统的冷战政策的冲力已在 70 年代后期蕴酿成型，缓和是这一趋势的受害者。

缓和趋于消亡的另一个因素来自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在 1979 年，谈判最终达成了一项协议，确定双方的导弹发射器（洲际弹道导弹和潜艇发射弹道导弹）以及重型轰炸机的总额不得超过 2400 枚（架）的水平，同时也对为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配套的导弹发射器数量规定了一个最高限额。尽管各方都没能从第二阶段的谈判中得到有决定意义的好处，然而，美国却越来越担心苏联正主要在洲际弹道导弹的重量和数量上谋求战略优势。1979 年，当一个苏联作战旅在古巴被发现后，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条约，这就为军控与缓和划上了句号。

1979 年 12 月，苏联入侵阿富汗，这给缓和以最后的致命一击。卡特总统以略带夸张的口吻将苏联的入侵描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世界和平的最大的一次威胁”。苏联的行为是出于企图把它的影响明目张胆地扩张到波斯湾地区的战略计划呢，还是仅仅对一个地区局势作

出的反应，尚不得而知。但重要的是这场入侵所带来的后果。

苏联对于阻止一个反共的伊斯兰共和国出现在它的边界上是有极大兴趣的。正因为如此，苏联向阿富汗派出了一支 8 万人的部队以武力去维持刚被它建立起来的巴布拉克·卡尔迈勒政府。入侵规模之大使美国大为吃惊，它促使卡特政府重新实施传统的遏制战略。但是，回到冷战的理论和政策的不是 1981 年罗纳德·里根的共和党政府，而是在总统任期内最后一年的卡特政府。

缓和——是一个失败？

华盛顿和莫斯科对缓和的期望各不相同。尼克松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安全顾问，后来成为国务卿的亨利·基辛格明确无误地表达了他的观点。他认为，对美国来说，缓和意味着苏美之间的竞赛必须有个规范，两大国在发展军备和第二世界的问题上应提倡合作。基辛格对缓和的看法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一个再也不存在无可争辩的军事优势的世界里，美国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

苏联希望通过缓和去控制军备竞赛，增强与西方的贸易联系，让西方承认它作为一个同等超级大国的现状。苏联在品尝了几十年军事劣势的苦头后，终于获得了核平等地位，现在它想行使一下反映这一新地位的权力。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这意味着它要在第三世界中扩大它的影

响，而正是这个过程使缓和之路走到了尽头。

当罗纳德·里根 1981 年 1 月当选总统的时候，缓和被认为是一个失败而被一笔勾销，莫斯科也因它的消亡而备受指责。然而，这是一个失败吗？与美国的政治家相比，那时某些历史学家却用一种较为同情的目光看待缓和，比如，J·L·加迪斯就认为，对缓和的指责首先是建立在对什么是缓和的一种误解之上的。他认为，缓和既不是企图结束军备竞赛，也不是消弥苏美在第三世界的争夺，缓和更不是为苏联的改革提供一种有用的手段，尽管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一些议论。缓和的口的倒是与苏联共同努力防止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分歧不断演变为险象丛生的危机。

平心而论，缓和确实取得过一些成果。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条约限制了某些战略武器的发展；柏林这个冷战中的滴疾被欧洲的缓和所消除；在中东，苏联的力量被大大削弱，苏联在经济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离不开西方。也许，一个最为重要的成果就是华盛顿结束了把目光只盯着被基辛格称为“大洲上的一个小半岛”的越南的不能自拔的困境，而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些举足轻重的全球性问题上来。

当然，以华盛顿的观点，缓和在三个主要方面没有达到它的目的：即联动、军事均衡和人权。联动的目的是试图用一系列正负强化的手段去改变苏联的行为。之所以失败，一部分原因是美国并不清楚究竟要从

苏联那里得到什么，造成这一失误的主要原因是总统与国会的权力分离：经常被反对党控制的国会否决总统签署的协定。比如，杰克逊参议员要求苏联在取得贷款和最惠国地位之前增加苏联犹太移民，结果招致1972年的苏美贸易协定付之东流。而此前尼克松政府已向苏联递话，使其相信签署贸易协定是报答苏联在柏林、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东和越南问题上的合作。

缓和没有达到真正军事均衡的目的。尼克松和基辛格的目标是决不让苏联人在某些战略武器方面占优势。恰恰相反，尼克松政府希望在不受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协定限制的领域（如B1轰炸机、三叉戟潜艇和MX巡航导弹）寻求军事集结，但是越战的噩梦使国会大砍所有军费，因此，在某些战略武器方面，美国落后于苏联。为此，有人怪罪于缓和，事实上，正是国会内的反战情绪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发生。

第三方面的失败在人权。最常听到的对缓和的指责之一是缓和忽视了对外政策中的道德性。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对外政策被指责为把稳定和秩序置于正义和道德之上。诚然，他们两人确实喜欢悄悄行动，比如，与中国的谈判和关于军备控制的会谈就是如此，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没能说服国会和公众了解他们这种战略的妙处。但是他们却错误地大谈缓和，最明显的一个例子莫过于1975年关于人权问题的《赫尔辛基协议》，这一协议使西方以为苏联集团在人权领域的作为已有了改善，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第七章 里根、戈尔巴乔夫和冷战的结束(1981 年—1991 年)

里根总统和“第二次”冷战(1981 年—1985 年)

1980 年罗纳德·里根的当选标志着美国政策的一大变化，他上任时苏美关系正处于 20 年

来的最低谷。里根毫不留情地痛斥美国 70 年代的对外政策，他对缓和以及军备控制的指责主要集中在三个话题上：第一，华盛顿决不可能与一个极权国家保持稳定关系；第二，苏联打着军控（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幌子实际上已取得了领先于西方的军事优势；第三，美国军事优势的丧失并非不可避免，相反，美国恢复其军事“安全限度”是可能的。

里根是一位充满自信的政治家，与苏联进行意识形态的对抗是他的本能。1983 年他斥责苏联是一个“罪恶帝国”，所幸的是，这一对抗态度并没有演化成对抗政策。1982 年被任命为国务卿的乔治·舒尔茨要求与莫斯科一起对军备实行控制，里根本人在发表苏联是“罪恶帝国”讲话仅 1 年后也表示：“我们准备与苏联进行建设性谈判。”苏联新

领导人尤里·安德罗波夫警告说，如果美国继续推行军事优势政策，那么两国将继续斗下去。

在未取得军事优势地位以前，里根是决不会恢复军控谈判的。为此，里根政府制定了一项五年计划，打算花费 1800 亿美元实现美国战略部队的现代化。但是，欧洲日益高涨的反核运动和美国国内的“冻结”行动迫使华盛顿回到了谈判桌旁。

首先要谈的是欧洲中程核武器问题。1971 年以来，苏联一直在部署一种针对西欧的更为精确的新型中程核武器 SS-20 导弹，而北约却没有任何导弹能与之匹敌，因此，华盛顿迫于西欧领导人的压力，不得不在 1979 年接受著名的“双重决定”：首先，在联邦德国部署潘兴-2 弹道导弹，在包括英国在内的其他欧洲国家部署陆基巡航导弹；其次，向苏联建议只要苏从欧洲撤出所有的 SS-20 导弹，北约也不在欧洲部署任何核武器。在 1981 年进行的关于中程核力量问题的谈判中，里根提出“零点选择”建议，但遭苏联拒绝。当北约于 1983 年 12 月开始部署潘兴导弹和巡航导弹时，莫斯科立即中止了会谈。1983 年是苏美关系自古巴导弹危机以来最糟糕的一年。1982 年开始的讨论战略核力量的削减战略武器谈判与中程核力量谈判同时中止。1983 年 3 月上旬，里根宣布了战略防御计划（SDI），这一计划将在太空部署一个由激光武器和粒子束武器组成的保护罩以对付弹道导弹。这个“星球

大战”讲话不只是解决美国易受来袭导弹攻击的另一个建议方案，这个讲话把进攻性武器描述得一无是处，从而把整个战略图景变了个样。对于“相互确保摧毁”这一观点，里根始终耿耿于怀，而“星球大战”可以给他提供一个劳伦斯·弗里德曼所说的“从核困境下大逃亡”的机会。大多数科学家认为，要在太空建造一个完全有效的保护罩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我们将会看到里根的继任人乔治·布什上台后就放弃了这一计划。然而，苏联却在80年代把“战略防御计划”看作是决心为军备控制另辟蹊径的总统做的一场噩梦加以认真对待。苏联认为，如果这项计划得以实施，那么美国就可以免受苏联的攻击，如真是这样，那就打破了基于“相互确保摧毁”战略上的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均衡。

里根对缓和与军备控制的指责以及他对建立一个强大的核防御体系的执着使美国的西欧盟友们深感不安。1983年部署的潘兴导弹和巡航导弹不但没有给欧洲人带去安全，反而产生了负面影响。接着，里根单方面宣布战略防御计划使众多的欧洲人看到最大的战争威胁不是来自苏联的所作所为，而是来自军备竞赛本身和美国的霸道行径。西欧仍热衷于单独与苏联寻求缓和。1980年在波兰出现了一个反共的工会组织——团结工会，第二年，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的政府实行军管，团结工会遭到取缔。当华盛顿对波兰和苏联实施经济制裁时，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关系更趋紧张。

1981年里根上任时就断言“苏联是引起世界不安的起因”。里根政府作出了保护中美洲萨尔瓦多右翼政府，打击左翼游击队的选择；里根政府派驻联合国的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在“独裁”专政和左翼“极权”专政之间划了一条著名的界线：前者对美国友善，可以逐渐进化为民主国家，后者绝无此可能。里根希望尼加拉瓜停止向萨尔瓦多游击队提供武器。当美国国会拒绝向尼加拉瓜反革命武装（Contras）提供援助时，里根却把这一决定搁在一边，继续向“自由战士”提供秘密资助。

戈尔巴乔夫和里根（1985 年—1989 年）

在里根的第一个任期内，苏联由于在 3 年内三位领导人先后逝世正经历着一个过渡阶段：1982 年 11 月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逝世，接着是 1984 年 2 月尤里·安德罗波夫和 1985 年 3 月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先后病故。那几年里，克里姆林宫一直被说成是老人病房兼殡仪大厅。更糟糕的是，由日益显示出的僵化经济而引发的政治危机给苏联带来阵阵剧痛。20 年内，经济增长速度连续下降，从 60 年代的 5 写多一点下降为 80 年代初的 2 %。苏联在微电子和计算机等主要技术领域的颓势更为明显，与西方的差距正在扩大。

苏联是一个畸形的超级大国：军事上，它与美国并驾齐驱，但经济上，它远远落后于对手。按人均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很低，产品质量差，

大部分人口还从事着农业生产，而且连年歉收。以原材料出口为主的经济状况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极为相似，与西欧或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无法相比。到 80 年代初，“各种相互关联的力量”（常用来形容竞争国力量的一句马克思主义术语）正向不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着。

1985 年 3 月 11 日契尔年科逝世数小时后，苏共中央全会选举米哈伊·戈尔巴乔夫为党的总书记。54 岁的戈尔巴乔夫属于不了解斯大林的恐怖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新一代，所以，他才可能制订出一套革命的对内对外政策。这些政策实施的后果尽管不是出于本意，却造成了在东欧的苏维埃帝国的崩溃、冷战的结束和苏联自身的解体。

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两个俄罗斯新词汇进入了政治语言，这就是 *perestroika*，意即新思维，和 *glasnost*，意即公开性。公开性的概念标志着与一个先锋队政党的布尔什维克思想的决裂，这是一个掌握着“正确”路线，领导着一大群落后人民的党。但，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公开性是一把双刃剑，它可能被一群人用来反对从未受到过挑战的共产党的统治。公开性可能在两个方面发挥它的作用：它既有可能吸纳来自党外的新思想去鼓励政治上不同意见的辩论，同时它也有可能破坏共产党的权威。开始时是一场改革，而结束时可能变成了一场革命。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在国际事务上提出了“新思维”，他说在核战争中

不可能有“赢家”，他声言这个世界是相互关联的，他把所有的人比喻为被一条绳索捆绑在山腰上的攀援者。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标志着冷战开始结束，确实，他一上台就着手去结束这场冷战。军备控制实质上是为了寻求与美国的政治妥协。戈尔巴乔夫与里根在1985年至1988年间一共举行过4次首脑会谈，到80年代末，苏美两国关系从冷淡与交恶变成了信任与和解。

1985年11月，在日内瓦举行的首次首脑会谈上没有取得任何实际结果，但两国领导人在公报中一致同意“核战争赢不了，不能打”的观点。这一声明代表了苏联在观念上的一个重大转变，并暗示了苏联有可能考虑削减它的洲际弹道导弹部队。然而，苏联对战略防御计划所持的反对态度成了军备控制谈判中达成任何实际协议的一个主要障碍。

里根与戈尔巴乔夫的第二次首脑会谈是1986年10月在冰岛雷克雅未克的一所怪屋内举行的。在核外交的历史上，这是一次最为奇特的会谈。雷克雅未克会谈的议事日程与美苏两国的期待背道而驰，既不是谈什么军备控制问题，甚至也不谈削减武器的问题，而是把核时代里最没有意义的问题——完全裁军——作为首脑会谈的话题。在最后一轮会谈中，里根呼吁在10年内销毁所有的弹道导弹，而戈尔巴乔夫则坚持美国必须把战略防御计划的研制限制在“实验室”内，里根对此毫不让步，首

脑会谈终告失败。

里根与戈尔巴乔夫编织的无核世界的美梦只是一个梦想。虽然首脑会谈失败了，但却为日后在三个领域内的稍低层面上达成一致奠定了基础，这三个领域分别是：销毁美苏两国的陆基中程导弹、大量削减战略防御武器和共同承诺不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或只在一段商定的时期内推进战略防御计划。雷克雅未克会谈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削减战略武器和中程武器的协议有赖于就太空武器是否能达成协议。这是一个要么包罗万象，要么一无所有的一揽子计划。1987年12月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三次首脑会谈上，戈尔巴乔夫给这一揽子计划解开死扣，提出了一个完全独立的关于销毁陆基中程和短程导弹的建议。

在削减美苏两个大国核武库的问题上，中程核力量条约（INF）的签署是重要的第一步。在军备控制谈判的历史上还是首次就一个广泛的核查程序问题达成了协议，授权在搜集数据和目睹导弹销毁的国家之间进行相互监督。中程核力量条约表明，军备控制不仅有可能简单地加以限制，而且有可能加以逆转，正因如此，它在核武器谈判过程中树立了一块里程碑。

第四次首脑会谈于1988年5月在莫斯科举行，但未能就如何削减各自的战略核武器问题达成一项协议。障碍同样来自对战略防御计划的问题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然而，尽管第四次首脑会谈没有任何结果，但

它并没有阻止削减武器谈判的势头。更重要的是，戈尔巴乔夫几乎一手抹掉了美国关于苏联是一个“罪恶帝国”的看法。

尽管戈尔巴乔夫代表自己的国家把他的公共关系演绎得相当出色，但是，把他的对外政策的本质说成是“衰败外交”也许是相当准确的。他与华盛顿达成的一些军备控制的协议没有使美国倒是使苏联作出更多的削减；在反对北约部署巡航导弹和潘兴导弹方面，苏联已形不成什么宣传攻势；1988年4月，莫斯科同意从阿富汗分阶段撤军方案，而置他们选定的喀布尔领导人的死活于不顾；在东欧，政治和经济改革所聚集的动力促使那里的苏联帝国于1989年整个儿崩溃。如把它放到一个帝国最终衰败的大背景下去看，那么，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策的“胜利”侄红是卓有成效的。

里根在1981年至1989年间的总统任内，其对外政策让评论家们感到困惑不解。一方面，不断有人强烈指责里根政府在中美洲的对外“侵略”政策，还批评里根相信一个现代化的核导弹的防护罩，即战略防御计划的可行性。1986年里根政府向伊朗秘密销售武器，向尼加拉瓜反共的反政府叛乱武装提供援助一事被揭露，所谓的“伊朗门事件”对里根总统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另一方面，因他完全改变了与苏联进行的核辩论的本质，里根又应该受到赞扬。在里根的努力下，关于武器限制的毫无成果的谈判进程变成了关于武器削减的一系列创造性谈判。在

80年代初开始的新一轮冷战中，里根担当了一个主要角色，到80年代后期，他又成了推动与苏联真正和解的原动力。

1989年：东欧革命年

这是欧洲战后历史上不可思议的一年。在短短几个月内，苏联势力范围内的所有东欧共产党政权就分崩离析，烟消云散了。英国记者蒂莫西·加顿·阿什在捷克革命中途的11月23日到达捷克，并对后来的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说：“波兰花了10年，匈牙利花了10个月，民主德国花了10个星期，捷克斯洛伐克也许只花10天时间。”

东欧各国各自都有推翻共产党政府的理由，但是对所有有关国家来说，以下三个方面是共同的：第一，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发挥的作用。他公开宣称放弃勃列日涅夫主义，勃列日涅夫曾经说过，为了把社会主义国家保持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内，苏联有权对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军事干涉。因此当一个东欧共产党政权受到革命威胁时，苏联不再主动出兵保护，从而使一场革命成为可能。第二个理由很简单，这就是共产党失去了广大群众的支持。第三，在过去的10年内，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缓慢。当西欧正自信地阔步向前之时，东欧却因低增长、高外债和人均国民产值低而止步不前。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1965年—1982年），苏联的影响几乎

是消极的，换言之，来自东欧共产党政权内部的改革都是不能容忍的。大海啸开始于1980年夏的波兰，结果出现了一个“团结工会”这样的工会运动。在革靶斯克列宁船厂一名电工莱赫·瓦文萨的领导下，团结工会进而向政府提出要求，要政府真诚接纳独立的工会组织，停止新闻检查并释放不同政见者：，1981年，波兰实行军管，团结工会被迫转入地下，但是在80年代中，它的力量不断壮大，到1988年波兰经济一团糟时，它迫使政府承认团结工会为合法，并于次年举行大选。1989年6月，大选的结果导致整个共产党领导的垮台，团结工会赢得了国会100个席位中的99席。12月，国会正式从政府中把共产党领导排除出去，并且恢复战前的国名——波兰共和国。

与波兰不同，匈牙利的改革动力来自共产党内。1956年以来一直领导着匈牙利共产党的亚诺什·卡达尔被党撤换，1956年革命中被处决的领导人伊姆雷·纳吉被重新安葬，恢复名誉。1989年10月，新的匈牙利共和国宣布成立，并于1990年3月举行自由选举。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其他东欧国家的情况都不相同。建立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上的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不如说是一个政权，它存在的惟一原因就是维护社会主义：什么时候社会主义失去信誉，民主德国政权就要垮台。民主德国政府不是垮于改革后的一段时间，而是垮于拒绝改革，这一情况与波、匈不同。借助于柏林墙的保护，自1961年以来的

整个 60 年代，民主德国经济得以复苏，但到 80 年代，它的经济却停止不前。当匈牙利在 1989 年 5 月开放了它与奥地利的铁丝网边界后，民主德国再也无法阻挡它的难民潮水般地背井离乡了。大规模的反政府群众示威导致了 1989 年 11 月 9 日柏林墙的倒塌，这一事件注定了共产党政权的寿终正寝。1989 年的捷克斯洛伐克革命，从 11 月 17 日发生到 11 月 27 日结束仅 10 天时间。捷克改革运动是政治外行们的所为，为首的是剧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他曾因支持不同政见者坐了多年的牢。11 月在布拉格发生的示威游行要求共产党放弃统治，导致了政权的颠覆。1989 年 12 月 30 日哈维尔当选为总统。保加利亚托波夫·日夫科夫的共产党政权也在 1989 年 11 月被推翻。罗马尼亚是东欧最后一个爆发革命的国家，1989 年 11 月 25 日，当群众与国民卫队在布加勒斯特市中心发生暴力冲突后，齐奥塞斯库总统被推翻。

除了罗马尼亚，所有这些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们都是不流血的，这与 1848 年的欧洲革命不同，1989 年在欧洲没有反革命。东欧那些“人民民主共和国”是外界强加给人民并靠苏联的力量支撑起来的政权。当戈尔巴乔夫清楚地表明苏联不再给予支持的时候，它们就垮台了。那么，在 1989 年的一系列革命的背后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在起主导作用呢？拉尔夫·达伦多夫在题为《欧洲革命的反思》的书中坚持认为，不能简单地把 1989 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理解为推翻共产党而赞

成资本主义。诚然，它们是选择自由的宪政革命，但1989年死亡的，用拉尔夫·达伦多夫的话说，“是对一个‘真理’被独家统治着的封闭世界的信念。”

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1989年—1991年)

在西方，几乎没有哪一位观察家能事先预料到苏联会在80年代末崩溃。在这里，回想一下戴·托克维尔在19世纪提出的一个论点还是很实用的，他说，革命不是发生在专制政权大肆镇压的时候，说得更确切些，革命是发生在它们正寻求改革的时候。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正是如此。当戈尔巴乔夫1985年掌权时，苏联还没到崩溃的程度，苏联开始解体是执行他的一系列政策的结果。

戈尔巴乔夫最严重的弱点之一，是他不懂得民族问题的革命潜力。在1988年和1989年卡拉巴赫自治州的亚美尼亚人要求脱离阿塞拜疆；格鲁吉亚要求从中央控制下独立；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这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也主张独立。戈尔巴乔夫愿意给这三个共和国以更大的自治权利，但是其他保守的反对派担心他的改革政策可能导致苏联的分裂，这就是1991年8月发生反对他的政变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戈尔巴乔夫相信“苏联人”这个概念，换言之，他相信存在着一个可以超越民族特性的苏联。然而，正如我们已经在东欧看到的

那样，革命吞噬了他的改革。在 1989 年这个历史性一年的年终，戈尔巴乔夫与布什总统在马耳他会面时宣称：“我们再也不把你们看作为敌人了。”马耳他首脑会谈成了冷战结束的象征。

冷战的结束对欧洲以外的世界产生了影响。古巴军队 1991 年撤出安哥拉，从而结束了自 1975 年以来在那里的内战；1989 年，越南迫于苏联的压力从柬埔寨撤军；在中美洲，苏联停止对古巴的支持，导致古巴削弱了对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叛乱者的支持，从而促使尼加拉瓜桑地诺政府在 1990 年举行大选，产生了一个联合政府；在非洲之角，继苏联停止对埃塞俄比亚的支持后，美国也停止了对索马里的支持，埃、索两国间的战争随之结束。

冷战结束后一年半，苏联才宣告解体。1990 年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合并，结束了欧洲分裂的局面。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以及丧失东欧的问题上，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国内受到指责，他那来自左翼的主要挑战者是在 1991 年当选为俄罗斯共和国总统的鲍里斯·叶利钦。而推翻戈尔巴乔夫的八月政变的策划者是一些强硬路线分子，八月政变失败的原因是因为叶利钦没有动摇，军队拒绝参与。不过，这场未遂政变的结果使执政了 74 年之久的共产党遭到取缔，苏联本身在之后 8 月至 12 月的 4 个月内终于解体。

美国的政策对苏共垮台究竟起了多大作用呢？遏制政策的建筑师

乔治·凯南在 1992 年的《纽约时报》上发表一篇文章，说对苏联内部的变化，美国实在是没有什么影响力的。但是凯南提出遏制政策的初衷就是设想遏制政策将可能鼓动苏联内部发生爆炸。而苏共的崩溃确实来自内部，这一崩溃也确实是在里根和布什两位总统任内美国推行一条对苏强硬政策的时候发生的。但是，必须牢记的是，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始终在产生着改革和革命的动力，而这个进程的快慢并不是主要由它与美国的关系来决定的。

结束语

战根本上就是美国与前苏联之间的对峙，双方都被一种信念所激励着，这就是对方的意识形态必须被摧毁。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赌赛，一方的胜出是以另一方的牺牲为代价，绝不可能共存。前苏联坚持列宁的信念，即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美国相信，只有把共产主义恶魔从世界上驱除掉，才能有和平与稳定。每一方都向对方发起无数次的攻击。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莫斯科的摩尼教共产主义世界观把资本主义纯粹视为一个恶魔，这种世界观与华盛顿的摩尼教世界观是水火不能相容，后者同样把共产主义绝对视为一个恶魔，因此，各方都想千方百计地来证实自己的预言。

我们已经知道，1946 年乔治·凯南在 8000 字的长电报中概述的有关遏制的教义成了 1945 年以来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础。凯南争辩说，美

苏所采用的方法和设定的目标是不能调和的，因此，美国必须进行长期的斗争。在将来，什么时候前苏联这个“非法”政府从内部崩溃了，什么时候这场斗争就会停止。这正是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前苏联发生的事情。然而，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不是美国取得了“胜利”，而是美国懂得了在冷战时期如何构想自己的对外政策。

遏制政策想极力维持现状，强烈反对美国对共产主义发动一场十字军东征式的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冷静而精明，甚至有点消极的思想；但是，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它不是把追求力量均衡而是把追求前苏联社会的转变作为终极目标，这又反映了美国的一种乌托邦思想。从伍德罗·威尔逊开始，美国外交的传统一直把自己的利益限定在普遍的原则和价值上，而不是在领土和国家安全上。美国对外政策上的这种道德倾向在杜鲁门主义上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位总统以威尔逊的口吻谈论自由和极权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斗争，并发誓说他的国家将支持自由。就是在朝鲜，确切地说，美国不是根据地缘政治上的意义，而是根据原则——即不能容忍共产主义进行入侵却不遭反对——履行对韩国的保护。美国对外政策的试金石不是国家利益而是自由。

正因为用这样一种思想方式去观察世界，美国把任何一个独特事件都看成是全球共产主义的威胁，甚至是共产主义阴谋的一部分。于是，捷克政变（1948年）、柏林封锁（1948年—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的胜

利(1949年)和朝鲜战争(1950年—1953年)，在冷战后最初几年中，对加固美国的反共思想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欧洲，很难把共产主义与前苏联的强权区分开来，但是在亚洲，共产主义往往体现在一种间接的力量上，越南就是例证。美国不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去看越南问题的，而是设想越南北方受制于北京，而北京又受制于莫斯科。因此，保护越南南方就成了一个高于利益的原则问题，一直到很晚的时候，美国才发觉要想体面撤出已没有可能了。

尼克松是较能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去思考冷战问题的第一位总统。在越战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尼克松和基辛格抓住1969年中苏发生边境冲突的有利时机打开了与中国对话的大门。当美国士兵正在越南战场上丧命之时，尼克松正在北京受到毛泽东的欢迎，这等于是抛弃了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使苏、中、美之间的三边外交在70年代成为可能。而在里根总统任内，事情发生了逆转，由于把前苏联说成是“罪恶帝国”，美国对外政策的很多方面与威尔逊的道德传统是背道而驰的。

然而，到80年代，前苏联发生的事情是至关重要的，而美国发生了什么并不重要。在结束冷战方面，戈尔巴乔夫为首的前苏联新一代领导人发挥了关键作用。虽然戈尔巴乔夫还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但是他放弃了与西方世界的冲突不可避免的观点，这样，他从根子上改变了美国的遏制政策，尽管这一政策实质上是对来自前苏联真实的或虚假的威胁

作出的一种反应性姿态。在这一进程中，1989年的一系列革命是有决定意义的。冷战开始于东欧，也结束于东欧。一旦苏军撤出东欧，通往结束欧洲分裂的道路就通畅了，随之而来，冷战也就宣告结束。冷战是两种敌对制度之间的一场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斗争，同样重要的是，这场斗争发生在核时代第一个50年内，核武器的存在极大地改变了这场斗争的性质。在整个冷战时期，虽然核决战的黑云高悬于天空之上，但是苏美两国自1945年以来谁也没有因愤怒而使用核弹，核武器确实对莫斯科和华盛顿发挥了制约作用，防止地区性冲突发展成为一场全面大战的危险。不使用的“传统”从此确立，随着冷战每10年的一次推移，这一传统越来越光大，新型武器既造成危险，也带来制约。

尽管美苏之间进行着激烈的意识形态的对抗，然而，事实上冷战也包含着强大的稳定因素。整个冷战时期，也就是20世纪最长的一段和平时期，这一事实使一位历史学家将冷战重新定义为“长期和平”。核武器使人们有史以来第一次把战争看作是不可思议的，这一态度的根本变化影响了超级大国的所作所为。不论前苏联与西方之间有多大的分歧，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这就是制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核时代，危机取代了战争。那么，在一个没有任何超级权威的世界体系内如何规范秩序的问题被提了出来。显然，联合国在发挥一个超机构的功能，以维持和平方面无能为力。看起来，华盛顿和莫斯科都已默默接

受了涉及如下一些方面的某些不成文的规则：即尊重各自的势力范围，避免直接的军事对抗以及不使用核武器。关于势力范围问题，美国从未一本正经地想把前苏联驱逐出东欧，而前苏联虽没有公开同意却也容忍了美国在西欧、地中海、中东和拉美发挥影响作用。事实证明，哪些地方残存着的影响未被清除干净，哪些地方必然会出现严重的危机或者说真正的冲突，在 1948 年的西柏林、1950 年的朝鲜和 1960 年的古巴，情形都是如此。

避免直接的军事对抗是两个超级大国一直悉心追求的目标。1945 年后由各方参与的主要的三次有限战争是：美国在朝鲜和越南以及前苏联在阿富汗的战争，但是其中没有一场是美苏直接的军事对抗。双方都想通过代理人或以间接的方式扩大或保持对该地区的控制。前苏联赞同朝鲜于 1950 年进入韩国，而自己却不直接卷入；70 年代前苏联借助古巴军队将自己的利益推向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美国通常是通过暗地里的影响（中情局）保护自己的势力范围。

至于核武器问题，双方都发扬了自我约束的传统。双方虽然都曾不时扬言，它们打算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但实际上做的又是一回事。1955 年以前，当只有美国独家拥有核武器的时候，它就开始确立了一个不使用的习惯。杜鲁门不在朝鲜战争中使用核武器的决定在核时代的国际关系史上划下了一道分水线。麦克阿瑟将军提出的使用核武器取得胜

利的要求在 1951 年遭到拒绝，从这个时刻起，美国和全世界都接受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在核时代下的一场全面战争中，胜利不是惟一的选择。

在艾森豪威尔的总统任内，无论国务卿杜勒斯如何地好战，如何地能言善辩，不使用核武器的传统终于得到了确认。1954 年，艾森豪威尔拒绝了海军上将拉德福德提出的用原子弹去解救在奠边府被围法军的建议。在 1954 年的台海危机中，艾森豪威尔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明确表示，如有必要，美国将以核武器保卫台湾海峡，但与此同时，他也向蒋介石明确表示，美国不支持他进攻大陆。艾森豪威尔并非不想造成一种核威胁的明确态势（例如，在寻求结束朝鲜战争时），但是，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他总是发现使用核武器的后果是弊多利少。

前苏联又如何呢？1958 年至 1962 年间，冷战最危险的时刻莫过于苏关在柏林和古巴问题上的对抗。1958 年，赫鲁晓夫向占领西柏林的西方三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改变柏林的现状。当西方拒不让步时，赫鲁晓夫就收回了最后通牒。有迹象表明赫鲁晓夫只是想吓唬一下西方，让西方就柏林现状作些改变而已，他根本不想冒核战的风险。4 年后，在古巴问题上又出现了相同的情况。对双方来说，核战的风险是一个主要的制约因素。前苏联谨慎小心的态度在 1969 年与中国的边境危机中再次显现出来，那时中国只有少量的核弹头。

在 70 和 80 年代中，苏美都承认有必要在首先限制，然后削减各

自的核武库上达成协议，这一趋势主导了两国关系的走向。在维护核和平方面，双方都有各自的既得利益。正如戈尔巴乔夫在 1987 年所说的，“不论是社会主义者还是资本主义者，也不论是正义者还是犯罪者，核旋风都将把他们一扫而光。”果然不出所料，冷战没有在一场核爆炸中宣告结束，而是随着东欧和前苏联共产党的垮台降下了帷幕。